

## 舊傳統與新思潮：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

張健

### 摘要

詩文評屬於傳統學問，文學批評則為現代學科；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的變化，標誌中國學術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經歷了學理與心理的雙重建立過程。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文學是晚清時代民族自信的最後憑據，自新文學家宣佈中國傳統文學已死，摧毀舊觀念，遂有輸入西方文學、建立新文學之新思潮。建立新文學，需要文學批評指引；中國沒有現代文學批評，需要輸入西方文學批評。以西方文學批評整理詩文評，則詩文評從傳統學問成為現代學術。在此過程中，如何處理西方學術與中國傳統的關係乃關鍵問題，其得失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關鍵詞：詩文評、文學批評、新文學運動、楊鴻烈、陳鐘凡

---

2021/04/08 收稿，2021/05/25 審查通過，2021/06/01 修訂稿收件。

\* 張健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DOI: 10.30407/BDCL.202106\_(35).0003

# **Old Tradition and New Thought: from Comments on Prose and Poetry (Shiwen Ping) to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Jian

## Abstract

The changing of Comments on Prose and Poetry into Literary Criticism mark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It is the course of double construction academ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Facing the affect of western learning, literature is the last and only evidence of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declaration of the de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f creation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announced by the New Literateurs, the tide of introducing Western literature bega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was also introduced, because the guide from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was thought to be needed for construction of new literatu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ents on prose and poetry had been reviewed and reconstructed through principals and framework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came to be the modern academy. The key question is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academy and Chinese tradition in this course. Both it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are valuable for today and future.

Keywords: Comments on prose and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Yang Honglie (楊鴻烈), Chen Zhongfan (陳鐘凡)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一、新文學、文學批評與詩文評

胡先驥(1894-1968)〈說今日教育之危機〉(1922):「自清季國勢淒衰,外侮日至,國內執政者,漸知吾國物質教育之缺乏,於是曾文正始有派遣幼童出洋留學之舉。然當時猶以為吾國所缺者,物質科學耳。」「至戊戌、庚子以還,言新學者,始昌言政治之改革,於是紛紛赴日本習法政,國內學校亦逐漸成立。然習新學者,猶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至民國六年,蔡子民長北京大學,胡適之、陳獨秀於《新青年雜誌》提倡『新文化』以來,國人數千年來服膺國學之觀念,始完全打破。於是由研究西方物質科學、政治科學,進而研究西方一切之學問矣。」<sup>1</sup>此言晚清以來國人對待中西文明認識之變化過程。其第一階段實以張之洞等人「中(舊)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為代表,第二階段乃以嚴復譯介西方政治、經濟、哲學為代表,第三階段則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代表。<sup>2</sup>

伴隨認知轉變的是心理的變化。心理的變化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對於西洋文明的嚮慕心,一方面是對中國文明的自卑感。梅光迪(1890-1945)〈評提倡新文化者〉(1922)云:「國人倡言改革,已數十年。始則以歐西之越我,僅在工商製造也,繼則慕其政治法制,今且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學美術矣。」<sup>3</sup>「慕」已不單是認知層面,更涉心理層面。與嚮慕歐西同時,便是自覺中國文明不如西洋的心理。林語堂〈機器與精神〉(1929):五十年前,「那時的中國人只看見西洋人火車輪船電報槍炮等顯而易見的文明」,「五十年以來稍開通的國人,早已承認中國的政治政體不如西洋了」;「三十年來中國人也漸漸感覺中國的學術思想,科學方法不如西洋了」,「十年前的中國人又感覺連文學上,都有不及西洋人了,於是有近代文學的運動,儘量的翻譯西洋文學。」<sup>4</sup>此描述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及自身文明認識及態度的變化過程,與梅光迪所言雖細節不同,然大體一致,梅氏

<sup>1</sup> 胡先驥:〈說今日教育之危機〉,《學衡》第4期(1922年4月),頁9-10。

<sup>2</sup> 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胡適〉,《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頁519-574。

<sup>3</sup>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學衡》第1期(1922年1月),頁7;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頁127。

<sup>4</sup> 1929年12月26日在光華大學中國語言學會講稿,林語堂:〈機器與精神〉,《中學生》第2號(1930年2月),頁4。

所言涉及向慕西方的心理過程，而林氏所說乃中國人對固有文明之自信心從局部喪失到全面瓦解的過程：先是感覺技不如人，繼之認為制度不如人，再是斷定文化不如人，如胡適〈請大家來照照鏡子〉（1928）所說「大徹大悟地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sup>5</sup>正是在以上認知與心理的基礎上，遂有「再造文明」的新文化運動。

文學作為民族自信心的最後領域，當時的國人對之也經歷了從自負到自愧的變化過程：先是自負中國文學最優，繼之承認西洋文學可媲美中國，再者自愧中國文學不如西洋。在此基礎上，遂有新文學運動，全面輸入西洋文學。在這一過程中，林紓（1852-1924）與嚴復（1854-1921）的翻譯對文學觀念及心態的轉變所關甚重。胡適（1891-1962）〈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敘述 19 世紀末年的譯書事業，其範圍包括三類：一為宗教書籍，二為科學與應用科學書籍，三為歷史、政治、法制書籍，而文學、哲學書籍在當時還沒有人注意。「當時的中國學者總想西洋的槍炮固然利害，但文藝哲理自然遠不如我們這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了。嚴復與林紓的大功勞在於補救這兩個大缺陷。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sup>6</sup>鄭振鐸（1898-1958）〈林琴南先生〉（1924）說：「中國人自屢次為歐美人所戰敗後，對於他們的武器以及物質的文明，起了莫大的嚮慕心」，但「他們以為中國的道德文學及政治是高出於一切的」，不過只有「物質文明不如『西人』而已」，「這時的呼聲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到了後來，大家看出中國的舊的政治組織的根本壞處了，於是又嚮慕歐美的立憲政治與共和政治」，「在這個時候，還以為中國的不及人處，不過是腐敗的政治組織而已，至於中國人的文學卻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麗的，決沒有什麼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們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紹了不少的西洋文學作品進來，且以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太史公，於是大家才知道歐美亦有所謂文學，亦有所謂可與我國的太史公相肩比的作家」。<sup>7</sup>周作人（1885-1967）〈林琴南與羅振玉〉（1924）稱，「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

<sup>5</sup> 胡適：《胡適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31-32。

<sup>6</sup> 同上註，第2卷，頁274。

<sup>7</sup> 鄭振鐸：〈林琴南先生〉，《小說月報》第15卷第11號（1924年11月），頁12。

味」。<sup>8</sup>錢鍾書（1910-1998）也稱自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sup>9</sup>吳文琪（1991-1991）〈林紓翻譯的小說該給以怎樣的估價〉（1935）稱：「在從前，一般文人，雖然知道外國的科學比我們進步，但是一談到文學，總以為只有咱們中國是首屈一指的」，林紓「以《史記》來比附西洋小說，以司馬遷比附迭更司」，<sup>10</sup>「這種說法至少可以使一般文人知道西洋也有司馬遷一流的作家」，「自從林紓的譯本出版以後，一般人才掃除了『文學莫盛於中國』的謬見」。<sup>11</sup>林紓的翻譯轉變了國人卑視西洋文學的觀念，開始平視西洋文學。

鄭振鐸、吳文琪所云以中國文學為最優的「一般文人」的觀念，可推陳衍（1856-1937）為代表。據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云，1931或1932年，錢氏訪陳衍於蘇州，「陳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學的專科是外國文學，以為準是理工或法政、經濟之類有實用的科目。那一天，他查問明白了，就慨歎說：『文學又何必向外國去學呢！咱們中國文學不就很好麼！』」<sup>12</sup>錢鍾書解釋道：「好多老輩文人有這種看法，樊增祥的詩句足以代表：『經史外添無限學，歐羅所讀是何詩？』（《樊山續集》卷24〈九疊前韻書感〉）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在科學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學做為民族優越感的根據。」錢先生認為：「在這一點上，林紓的識見超越了比他才高學博的同輩」。<sup>13</sup>除陳衍、樊增祥（1846-1931）外，我們還可以舉出晚清桐城派的代

<sup>8</sup> 周作人：〈林琴南與羅振玉〉，《語絲》第3期（1924年12月），頁5，署名開明。

<sup>9</sup>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頁85。

<sup>10</sup> 吳文琪舉二例，一為林紓《塊肉餘生述·序》：「史班敘婦人瑣事，已綿細可味矣。顧無長篇可以尋繹。其長篇可以尋繹者，惟一《石頭記》。然炫語富貴，敘述故家，緯之以男女之豔情，而易動目。若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嘖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見〔英〕迭更司（Charles Dickens）著，林紓、魏易譯：《塊肉餘生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頁2。另一例為林紓光緒33年（1907）所撰《孝女耐兒傳·序》：「余嘗謂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為最難著筆。《史記·外戚傳》述竇長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逆旅中，巧沐沐我，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惜者，亦祇此數語。……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為家常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為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家常之事，用意著筆為難。」見〔英〕迭更司（Charles Dickens）著，林紓、魏易譯：《孝女耐兒傳》上卷（上海：中華書局，1915年），頁2。

<sup>11</sup> 鄭振鐸、傅東華：《文學百題》（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頁444-445。

<sup>12</sup>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頁108。

<sup>13</sup> 同上註，頁122，註60。

表人物吳汝綸（1840-1903）。吳汝綸序嚴復譯赫胥黎（T. H. Huxley，1894-1963）《天演論》，強調翻譯之文體的重要性：「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顧，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其後稱：「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吳氏再稱「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sup>14</sup>吳汝綸論西人之文以中國文章為標準，又推斷赫胥黎著作之文難儕唐宋作者，而嚴譯之文為之增價，使之可與晚周諸子比肩，此說顯然流露出中國文章優於西人之意。

周木齋（1910-1941）〈清代文人對於現代發生影響的算那幾人〉（1935）先是演述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說法，認為原來的翻譯西洋書，存了西洋的「形而下」學勝過中國，中國的「形而上」學也勝過西洋的觀念，翻譯科學和應用科學，即當時所謂「格致」的書。此外因傳教士來到中國，所以有宗教書的翻譯。因鑑於西洋各國的富強，出於要瞭解西洋國情的心情，所以有歷史、地理、政治、法典的翻譯。而「嚴復、林紓的翻譯，是足以衝破輕視漠視西洋文學、社會科學的瘴氣的」。<sup>15</sup>周木齋稱，由嚴復的翻譯，國人才知道西洋也有政治、經濟、哲學；因林紓的翻譯，才知道西洋也有小說。因為林譯小說本屬文學作品，而嚴復翻譯西洋的政治、經濟、哲學書，其原本和譯文都具有文學價值，因而可以說因嚴復、林紓的翻譯，才知道西洋也有文學。由翻譯的影響，一部分人以為西洋文學媲美中國，又一部分人以為超過中國文學。「風氣一開，從知道西洋的文學，進而認識西洋的文學，又從這一進，退而發現自己固有文學的缺點，再進而有取法西洋文學，改革自己文學的希圖，原是很自然的趨勢」。<sup>16</sup>在這種意義上說，林紓在由舊文學到新文學的轉變中作用獨特。寒光稱林紓「替舊文學做押陣的大將，為新文學探出一條外國的通路」，<sup>17</sup>正道出其獨特的作用及地位。

<sup>14</sup> [英]赫胥黎（T. H.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2。

<sup>15</sup> 鄭振鐸、傅東華：《文學百題》，頁437。

<sup>16</sup> 同上註，頁438。

<sup>17</sup> 寒光：《林琴南·序》（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頁1。

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91-1962）宣導文學革命，正是晚清以來觀念及心態變化的必然結果。陳獨秀〈文學革命論〉（1917）高呼「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宣稱「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sup>18</sup>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文學革命宣判了古典傳統的死刑，要建設新文學，固不能求助於傳統的死文學，因而輸入西方文學乃是必然的趨勢。胡適稱「創造新文學」既要用白話作工具，還要有方法，但「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故要「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sup>19</sup>胡適對待西洋文學的態度與嚴復、林紓迥然有別，不是西洋媲美中國，而是中國不如西洋。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1918）言及林紓、嚴復的翻譯時說：「譯者本來也不是佩服他的長處所以譯他；所以譯這本書者，便因為他有我的長處，因為他像我的緣故。所以司各得之可譯可讀者，就因為他像《史》《漢》的緣故，正與將赫胥黎《天演論》比周秦諸子，同一道理。」周作人不滿嚴復、林紓的譯書態度，「不肯自己去學人，只願別人來像我」，認為「我們想要救這弊病，須得擺脫歷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sup>20</sup>他之翻譯域外小說，主張直譯，便是真心學別人之意。

批判舊文學，輸入西洋文學，迅速形成風氣。梁實秋（1903-1987）〈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1927）指出：「在新文學運動最初的幾年，破壞的批評者便是這個運動的急先鋒，專門從事於毀滅我們的舊文學的標準與傳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舊標準果然毀滅了，『文以載道』這個道理不通，取消它，於是文果然不載道了。中國的文學不好，不要它，於是引進了大批的西洋文學」。「自五四運動以後西洋文學大批的輸入中國」，「近幾年來的中國新文學，實際上即是受西洋文學勢力所支配的文學」。<sup>21</sup>梁實秋與新文學運動的主流立場有異，但他的觀察在事實的層面是可信的。

<sup>18</sup>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全集》第1卷，頁54。

<sup>19</sup> 同上註，頁60-68。

<sup>20</sup> 周作人：《藝術與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162。

<sup>21</sup> 梁實秋：〈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東方雜誌》第24卷第23號（1927年12月），頁87、83-84。

按照新文學家的觀念，新文學的建立，需輸入西洋文學作為學習的典範，而西洋文學有文學批評做嚮導，中國要建立新文學，也需要有文學批評的指導，於是文學批評遂有了現實的迫切需要。胡愈之（1896-1986）是文學研究會的共同發起人，其〈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1921）是最早簡明系統西方文學批評的文章，在當時影響頗廣。文章開篇云：

「文學批評」這一個名辭，在西洋已經有過幾千年的歷史了；可是在我們中國還是第一次說及。中國人本來缺少批評的精神，所以那種批評文學在我國竟完全沒有了。我國文學思想很少進步，多半許是這緣故。近年新文學運動一日盛似一日，文藝創作，也一日多似一日，但同時要是沒有批評文學來做嚮導，那便像船沒有了舵，恐怕進行很困難罷。所以我想現在研究新文學的人，對於文學批評似乎應該有相當的注意。<sup>22</sup>

這一節代表新文學家關於輸入西洋文學批評的學理論述。周全平（1902-1983）《文藝批評淺說》（1927）：「假如文藝是一隻船，文藝批評便是這隻船底一個舵，假如文藝是一個孩子，文藝批評便是這孩子底保姆。沒有舵的船，是不易達到他底目的地的，沒有保姆撫育的孩子，也常有難於長成的危險。同樣，文藝而沒有文藝地批評時，這文藝便不能有意識地、迅捷地得著真正的進展。」<sup>23</sup>文學創作需要文學批評做為嚮導，這種觀念自有來自西洋的學理依據，如周全平所引聖柏甫（Sainte-Beuve，1804-1869）所云：「一個文藝創作作家應有一個文藝批評家為之匡導。」<sup>24</sup>按照這種觀念，西洋文學批評有幾千年的傳統，所以西洋文學思想進步；中國無文學批評傳統，創作缺乏指導，因而中國文學思想很少進步。中國要發展新文學，必需文學批評的指導，故要引進西方文學批評。

胡愈之的論述中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文學傳統中有沒有「文學批評」？<sup>25</sup>胡愈之本人認為中國「完全沒有」「那種批評文學」。這種表述顯

<sup>22</sup> 胡愈之：〈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東方雜誌》第18卷第1號（1921年1月），頁70。

<sup>23</sup> 周全平：《文藝批評淺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1章「緒言」，頁1。

<sup>24</sup> 同上註，頁3。

<sup>25</sup> 關於此一問題，陳國球有精當的論述。參見陳國球：〈文學批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兼談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20期（2013年12月），頁5-10；

示，胡愈之是以西洋文學批評作為普遍標準審視中國傳統，有文學批評是當然，中國無之是缺陷。正是建立在這種觀念基礎上，才有輸入西洋文學批評的必要性。當胡愈之如此論述時，已經隱含另一個問題：中國傳統的「詩文評」是否是「文學批評」？同是文學研究會創始人的沈雁冰（茅盾，1896-1981）就正式提出並回答了此一問題。沈氏〈「文學批評」管見〉（1922）稱：「中國一向沒有正式的什麼文學批評論；有的幾部古書如《詩品》、《文心雕龍》之類，其實不是文學批評論，只是詩、賦、詞、讚……等等文體的主觀的定義罷了。」<sup>26</sup>沈氏亦是以西方文學批評衡量中國詩文評，但其稱中國「沒有正式的文學批評」，較胡愈之的「完全沒有」語氣稍緩，等於承認中國的「詩文評」是非正式的「文學批評」。其〈文學與人生〉（1923）進一步申說：

中國向來文學作品，詩，詞，小說等都很多，不過講文學是什麼東西，文學講的是什麼問題的一類書籍卻很少，講怎樣可以看文學書，怎樣去批評文學等書籍也是很少。劉勰的《文心雕龍》可算是講文學的專書了，但仔細看來，卻也不是，因為他沒有講到文學是什麼等等問題。他只把主觀的見解替文學上各種體格下個定義。詩是什麼，賦是什麼，他只給了一個主觀的定義，他並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圖的《詩品》也沒講「詩含的什麼」這類的問題。從各方面看，文學作品很多，研究文學作品的論文卻很少。因此，文學和別種方面，如哲學和語言文字學等，沒有清楚的界限。談文學的，大都在修詞方面下批評，對於思想並不注意。至於文學和別種學問的關係，更沒有說起。<sup>27</sup>

此申說何以中國的詩文評不是「正式的文學批評」，其衡量的標準是西洋文學批評。新文學需要文學批評的指導，而中國沒有真正的文學批評傳統，故沈氏要談文學與人生這一重要的問題，「在中國向來的書裏，差不多沒有

---

張健：〈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朱自清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61-65。

<sup>26</sup> 茅盾：〈「文學批評」管見〉，《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頁101，原載《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1922年8月10日出版，署名郎損。

<sup>27</sup> 茅盾：〈文學與人生〉，《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頁110，原載松江暑期演講會《學術演講錄》第1期，1923年出版。

材料可以參考」。「現在只能先講些西洋人對於文學的議論，再來講中國向來的文學，與人生有沒有關係。」<sup>28</sup>「所以我們現在講文學批評，無非是把西洋的學說搬過來，向民眾宣傳。」<sup>29</sup>沈雁冰雖然承認傳統詩文評可以算作非正式的文學批評，但沒有現代的價值，對於指導新文學沒有實際的意義。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1922)：「中國的文學批評極不發達。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學誠之《文史通義》，亦多新意。其餘如詩品，詩話，詞話及《唐詩紀事》之類，大半都是不大合於文學批評的原則的。」<sup>30</sup>王統照(1897-1957)〈文學批評的我見〉(1923)：「中國以前的文壇上，只有種作為個人鱗爪式的觀察，而無有所謂『文學批評』，這也許是由科學化而來的新精神，『文學批評』，乃隨了近幾年來新文壇上的創作與介紹的波浪，在後面助著『波瀾』。」<sup>31</sup>「中國以前的文章，偶爾有幾片沙礫中的珠璣，說到批評，也多是些微末無足輕重的話，如同『四始彪炳，六義環深』(《文心雕龍·明詩篇》)這一類的話，只是批評比自己去堆砌詞藻，於批評二字，實難說到。」<sup>31</sup>這也幾乎是完全否定中國有文學批評的態度。

新文學家對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見解在當時具有相當的代表性。1924年，署名「和」的學者發表〈文學批評與編輯中國文學史〉，稱：「我們的中國，從古到今，嚴格的說來，未曾出現一冊文學的批評書，歷代的詩話之類，雖近於文學評論，然而離文藝評論的真價值，還遠的很呢，至多不過說這是文藝的極零碎的雜感罷了。」<sup>32</sup>同年，深受學衡派文化觀念影響的胡夢華(1903-1983)發表〈文藝批評概論〉，謂中國「文藝批評未成專門學問」，「我們歷來文藝之變遷，批評家實未有若何之影響」，「代表東方之中華偉大文學乃不能於世界文壇佔有重要地位，無文藝批評家出而標揚之，實為一大原因，今而後吾人欲發揚中華文學，則於文藝批評不可不三致意焉」。<sup>33</sup>胡氏同樣以西洋文學批評衡

<sup>28</sup> 茅盾：〈文學與人生〉，頁110。

<sup>29</sup> 茅盾：〈「文學批評」管見〉，頁101。

<sup>30</sup> 鄭振鐸：《鄭振鐸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6，原載於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第51期(1922年10月)，頁1。

<sup>31</sup> 王統照：〈文學批評的我見〉，《晨報副刊·文學旬刊》第1版第2號，1923年6月11日。

<sup>32</sup> 和：〈文學批評與編輯中國文學史〉，《晨報副刊》第1版，1924年10月15日。

<sup>33</sup> 胡夢華：〈文藝批評概論〉，《東方雜誌》第21卷第4號(1924年2月)，頁96-101。胡夢華為胡適宗侄，1920年入南京高等師法學校英文科，1921年隨校轉入國立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文化觀念受學衡派影響。

量中國傳統，但並未否認中國有文藝批評，然謂其「未成專門學問」，此立場實接近鄭振鐸「未有正式的什麼文學批評」，正惟如此，他也主張輸入西洋文學批評。與新文學家不同的是，其介紹西方文學批評的目的不是為建設與死文學對立的新文學，而是為發揚「中華偉大文學」。此實受梅光迪影響。梅氏〈中國文學在現在西洋之情形〉（1922）之言及漢學家翟理斯（H.A. Giles, 1845-1935）以「中國有若斯之文學，而不欲自顯於世」為不可解，故梅光迪提出中國有「文學宣傳之必要」，並提出具體途徑，而批評新文學家「不能自揚其善，而日以推倒固有文化為事」。<sup>34</sup>為此，他被視為「以反對『五四』新文學發揚中國文化自任的人」。<sup>35</sup>胡夢華主張以文學批評發揚「中華偉大文學」，實響應梅光迪之說。

梁實秋（1903-1987）文化立場也有異於新文化運動主流，但其對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認知卻接近新文學家。其〈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1927）稱：「中國文學裏，本來有文學批評這一類的作品，但大半不過是些斷簡殘篇，沒有系統的敘述，亦沒有明確的主張，例如詩話一類的作品，裏面也不是沒有一點半點的批評的材料，但未經整理與繹述之前，簡直不能算做正式的批評。」<sup>36</sup>梁氏此說實謂傳統詩文評屬於文學批評，但非「正式的批評」，觀念與鄭振鐸相近。若要使傳統的詩文評成為正式的文學批評，需要「整理與繹述」。其〈文學與科學〉（1934）說：西洋文學「有一點是我們中國文學所最缺乏的，那便是，西洋文學之整個的精到的一套文學理論。」<sup>37</sup>梁實秋認為，在新文學運動「混沌紊亂的時代，批評是不可少的」，<sup>38</sup>但中國缺乏西洋式的系統的文學批評，因而梁實秋主張輸入西洋文學批評。其〈近代來中國之文藝批評〉說：「自從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西洋文學成本大套的輸入中國，如同決堤潮湧而來」，「一般青年可以不讀四書，不讀五經，而談起莫泊桑、柴霍甫，則滔滔不絕如數家珍。……不過說也奇怪，在這樣濃郁的文學的空氣裏面，我們並找不到多少文學批評」。<sup>39</sup>文學批評

<sup>34</sup> 梅光迪講，何惟科記：〈中國文學在現在西洋之情形〉，《文哲學報》第2期（1922年7月），頁5。

<sup>35</sup> 賀昌群：〈哭梅迪生先生〉，《思想與時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頁13。

<sup>36</sup> 梁實秋：〈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頁83。

<sup>37</sup> 見梁實秋：〈文學與科學〉，《梁實秋文集》第1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頁432。

<sup>38</sup> 梁實秋：〈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頁88。

<sup>39</sup> 同上註，頁83。

如此重要，新文學運動雖大量輸入西洋文學，卻很少輸入文學批評，因而需要輸入西洋文學批評以建立中國文學批評。梁實秋本人即是西洋文學批評的輸入者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建設者。

## 二、西方文學批評的輸入與中國文學批評研究的知識基礎

對於新文學家來說，西方文學批評不僅是建設新文學的指引，也是整理傳統文學的依據。傅東華是新文學運動中大量譯介西方文學批評著作者，其〈《文學之近代研究》譯序〉（1925）：「外國關於文學原理的著作之有中國譯本，只是近幾年的事情。我們據一般出版家的經驗，可知現今中國讀者對於這一類譯本的需要，似乎比他們對於文學作品的譯本的要求大些。」<sup>40</sup>按照傅東華的觀察，當時的讀書界發生了一個變化：對文學原理譯著的需求開始大於翻譯的文學作品。其原因在於，當時受過學校教育的讀者經過一些科學方法的訓練，文學研究者「要用治科學的方法來治文學」，因而需要文學原理書籍，這是一種新觀念的需求。在傅氏看來，當時的讀者社會有幾種病症：一是古文家的遺毒，「以為文章之美只在字句聲調之間」，二是「道學家留下來的」「以文載道」，三是小學家和考證學家的方法，如章太炎關於文學的定義，「著於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sup>41</sup>這些都是錯誤的文學觀念，因而文學界需要正確的觀念指導，但傳統中國無文學原理著作可資借鑑，「舊書目錄集部詩文評類所載，為數既甚有限，而其中真正討論文學原理的文章更是不易尋覓，且即有之，亦漫無系統，決不足以饜近代讀者的要求。此外散見於各家文集的論文的文章雖不少，卻也只能供給後人為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史材，不經科學為之整理一番之後，決不能應付現代讀者的需要」。<sup>42</sup>一方面中國傳統無文學原理著作可資，另一方面「現今的中國作家……不敢輕易從事於這一類書籍的著述。因此一般想要探尋文學原理的讀者，勢不得不求之於外國人的著作」。<sup>43</sup>傅東華稱，其翻譯此書一為普通對文學有興趣的讀者，二為「有志於研究及整理中國

---

<sup>40</sup> 傅東華：〈《文學之近代研究》譯序〉，《文學週報》210期（1926年1月），頁326。

<sup>41</sup> 同上註，頁326-327。

<sup>42</sup> 同上註，頁326，按傅氏序文作於1925年。

<sup>43</sup> 同上註。

舊文學卻不知方法或錯用方針的諸君」。<sup>44</sup>詩文評的整理正是借鏡了西方文學批評。

在當時，整個新文學界與傳統文學研究領域具有共同的文學批評知識基礎，即是從西方直接或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洋文學批評。這些理論也成為整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基礎。茲述其與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密切相關者。

中國 1920 至 30 年代的文學批評觀念與知識基礎來自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數種西方文學批評著作。1921 年，胡愈之發表〈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此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早介紹西方文學批評的文章之一。作者所列西洋文學批評著作有：蓋萊（Charles Mills Gayley，1858-1932）與施各德（Fred Newton Scott，1860-1931）合著《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材料》（*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Bases in Aesthetics and Poetics*，1899），<sup>45</sup>韓德（Theodore Whitefield Hunt，1844-1930）《文學的原則和問題》（*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1906），<sup>46</sup>黑德生（William Henry Hudson，1862-1918）《文學研究導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1913），<sup>47</sup>莫爾頓（Richard Breen Moulton，1849-1924）《文學的近代研究》（*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1915）。<sup>48</sup>到 1927 年，梁實秋〈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說：「試舉西洋文學批評傑作之為我國人士所熟悉者，實在寥寥無幾，恐怕除了一部何德孫的《文學入門》，莫爾頓的《文學的近代研究》、文柴思特的《文學批評原理》以外，十分之九的西洋批評傑作，在我們中國是一個未曾發見的寶藏。」<sup>49</sup>梁實秋所列「我國人士所熟悉者」共三種，其中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何德孫《文學入門》（即胡愈之所列黑德生《文學研究導言》）兩種同於胡愈之

<sup>44</sup> 傅東華：〈《文學之近代研究》譯序〉，頁 326。

<sup>45</sup> Charles Mills Gayley and Fred Newton Sco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Bases in Aesthetics and Poetic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899).

<sup>46</sup> Theodore Whitefield Hunt,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sup>47</sup> William Henry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mpany, 1913).

<sup>48</sup> Richard B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sup>49</sup> 梁實秋：〈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頁 87-88。

所列，<sup>50</sup>文柴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r)《文學批評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899)，即景昌極、錢堃新所譯《文學評論之原理》。這幾部著作成為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創作及研究界有關文學批評觀念與知識的共同文本來源。這些批評理論影響中國文學界及學術界的途徑大致有以下幾種：英文原著、原著的中譯本、日本學者的轉介、中國學者的介紹。對於文學批評的常識建構及普及而言，中國學者的介紹作用最為直接，影響最為廣泛。

在文學觀念的層面上，新文學家推尊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此書在「傳統的」研究與「近代的」(現代的)研究之間劃出界限，而標舉文學研究的現代性。莫爾頓列出文學的現代研究的三大基本特徵：一是文學的統一(unity of literature)，歸納的觀察(inductive observation)，進化的觀念(evolution)。<sup>51</sup>由文學的統一觀念，確立文學的普遍性，打破文學的國家界限，文學的普遍性恰恰是新文學家主張輸入西洋文學的觀念基礎；歸納的觀察與文學進化的觀念正是新文學運動提倡的觀念。胡愈之文章重點介紹的就是莫爾頓的觀點。

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1922)：「中國文學所以不能充分發達，便是吃了傳襲的文學觀念的虧」，「我們研究中國文學，非赤手空拳、從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評論，一切文學上的舊觀念都應一律打破。無論研究一種作品，或是研究一時代文學，都應另打基礎。」<sup>52</sup>按照這種主張，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不能作為研究中國文學的基礎，研究的基礎應該是現代精神。「我們的新的文學研究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近世精神』上面的。」<sup>53</sup>鄭振鐸所說的「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就是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中提出的近代文學研究的三特徵：「他(莫爾頓)以為近代的精神便是：(一)文學統一的觀察，(二)歸納的研究，(三)文學進化的觀念。」<sup>54</sup>

<sup>50</sup> [美]韓德(Theodore W. Hunt)《文學的原則和問題》(*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由傅東華譯出，書名《文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

<sup>51</sup> Richard Breen Moulton, "Introduction: Dominant Ideas of Modern Study,"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p. 4.[美]莫爾頓(Richard Breen Moulton)著，傅東華譯：《文學之近代研究》，《小說月報》第17卷第1號(1926年1月)，頁2，(一)「導言：近代研究的主要觀念」。

<sup>52</sup> 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頁2；《鄭振鐸文集》第7卷，頁7、9。

<sup>53</sup> 同上註。

<sup>54</sup> 同上註。

鄭振鐸對莫氏近代研究三特徵做了詮釋，所謂文學的統一觀，就是「承認文學是一個統一體，與一切科學，哲學是一樣的，不能分國單獨研究，或分時代單獨研究」，<sup>55</sup>這實是莫爾頓宣導的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的觀念。鄭振鐸此前曾發表〈文學的統一觀〉（1922）引述莫爾頓的文學統一觀念，並作了自己的闡述。按照鄭氏的理解，這種文學的統一觀根源於人性的相同。「人類雖相隔至遠，雖面色不同，而其精神與情緒究竟是幾乎完全無異的」，「由這個人類本能的同一觀我們可以知道表現這個人類的同樣的本能——精神與情緒——的文學，也是必須『一視同仁』，決不容有什麼地域的人種的見解了」。<sup>56</sup>文學統一觀強調文學的普遍性，在這種觀念之下，文學的國族、文化以及語言差異變得次要。此一觀念不僅成為新文學運動的觀念基礎，也是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sup>57</sup>鄭振鐸以文學統一觀念衡量中國的文學研究，「我們中國的文學研究者，則不惟沒有世界的觀念，便連一國或一時代的統一研究，也還不曾著意，他們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個或幾個作家」，「中國人便連這片斷的個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sup>58</sup>

莫爾頓列為近代的文學研究精神的另一特徵是「歸納的觀察」，鄭振鐸解釋說這是「研究一切學問的初步」，研究中國文學「必須應用」這一方面，「把作品與作家仔仔細細的研究個公司的原則與特質出來」。<sup>59</sup>關於近代精神的第三特徵「進化觀念」，鄭振鐸闡說到「是把『進化論』應用到文學上來」，進化並不意味著「後者必勝於前」，乃是「說明某事物，一時期，一時期的有機的演進或蛻變」。<sup>60</sup>反觀中國的文學觀念，「中國人都以為文學是不會變動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做為後起之人的模範。所謂『學杜』、『學韓』，都是受這種思想的支配」。<sup>61</sup>

<sup>55</sup> 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頁2；《鄭振鐸文集》第7卷，頁10。

<sup>56</sup> 鄭振鐸：〈文學的統一觀〉，《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1922年8月），頁4。

<sup>57</sup> 此一觀念波及教育體制。聞一多主張將中國文學系與外文系合併成文學系，一如歷史系、哲學系，正是基於這種文學統一觀念，見聞一多：〈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國文月刊》第63期（1948年1月），頁1-2；朱自清：〈關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國文月刊》第63期（1948年1月），頁4-5。

<sup>58</sup> 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頁2；《鄭振鐸文集》第7卷，頁10。

<sup>59</sup> 同上註，頁2；同上註，頁10-11。

<sup>60</sup> 同上註。

<sup>61</sup> 同上註。

1926年傅東華譯《文學的近代研究》在《小說月報》(第17卷第1期始)連載,此書被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東方雜誌》1929年第26卷第1號圖書廣告:「《文學的近代研究》文學研究會叢書,……莫爾頓著,傅東華譯,三冊,印刷中,研究文學原理的必讀書。對於研究文學的近代的方法,文學的形式與分類等等,都有最精深的討論。」<sup>62</sup>但主張人文主義批評的梁實秋對於莫氏學說並不推崇,認為「確有價值,可供參考,然亦只可供參考,並非文藝批評之傑作,因其方法雖新穎,但是否完全合理成一家言則尚有問題。莫爾頓教授所代表之芝加哥派,其優點劣點,至今尚無定評」。<sup>63</sup>

學衡派雖與新文學家一樣主張輸入西方文學批評,但與新文學家推崇莫爾頓不同,他們尊崇溫徹斯特。溫徹斯特(又譯文柴斯特、文齊斯得等, Caleb Thomas Winchester, 1847-1920)所著《文學評論之原理》,<sup>64</sup>是最早被譯介的西方文學批評著作。此書之輸入與學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關係密切。梅光迪1920年曾在南京高師暑期課程講授《文學概論》,<sup>65</sup>即以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為教材。據劉文翮(1899-1988)〈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1922)稱:「往年從梅光迪先生學《文學概論》,得溫采司特之《文學評論原理》,當即指此而言。劉文翮「思欲譯之,未果」,「而同學景、錢二君,獨以一寒假而譯之」。<sup>66</sup>此書由梅光迪的學生景昌極(1903-1982)、錢堃新譯成中文,其第一章先載於《文哲學報》1922年第2期(7月),全

<sup>62</sup> 《東方雜誌》社編:《東方雜誌》第26卷第1號(1929年1月),頁184。

<sup>63</sup> 梁實秋:〈〈英文文藝批評書目舉要〉之商榷〉,《梁實秋文集》第7卷,頁147,原載《益世報·文學週刊》第29期(1933年6月)。

<sup>64</sup> 著者溫徹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r),是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英國文學教授,此書初版於1899年, Caleb Thomas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9)。

<sup>65</sup> 梅光迪曾於1920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暑期課程講授《文學概論》,見眉睫:〈《文學概論講義》整理附記〉,《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4期,頁102,引章衣萍〈胡適先生給我的印象〉,《文學概論講義》油印本為學生楊壽增、歐梁記錄,另有張其昀記錄本。或梅氏在東南大學期間亦講授過此課程。關於梅光迪《文學概論講義》,參見陳俊啟:〈由《文學概論講義》探尋梅光迪1920年代的文學思想〉,《成大中文學報》第56期(2017年3月),頁141-177。

<sup>66</sup> 劉文翮:〈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文哲學報》第3期(1923年3月),頁2。劉文翮與景昌極、錢堃新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同學,民國12年(1923)6月畢業,見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歷屆畢業生名錄〉,參見:<https://history.nju.edu.cn/02/83/c28628a459395/page.htm>,瀏覽日期:2021年4月20日。

書 1923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校者即為梅光迪。<sup>67</sup>溫徹斯特此書是西方最早的文學概論書籍之一。<sup>68</sup>其書提出文學四要素——情感 (Emotion)、想像 (Imagination)、思想 (Thought)、形式 (Form)，將研究方法分為三種模式：歷史的研究 (Historical approach)，傳記的或個人的研究 (Biographical or Personal approach)，批評的或文學的研究 (Critical or Literary approach)，認為第三種方法是文學的研究方法。溫氏文學四要素說成為當時中國新舊派文學家關於文學特徵的共識。本書中譯書名「文學評論」，可見當時「文學批評」還未成為一個穩定的中文學科術語。此書中譯 1923 年初版，1924 年 10 月再版，1927 年 1 月 3 版，在當時影響鉅大，對建構知識界之文學批評基礎知識具有重要作用，<sup>69</sup>也成為學者整理中國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

但是，梅光迪之以此書為教材，譯者之翻譯此書，其用意別有所在。劉文翻將此書的翻譯放到新舊文學觀念的論爭背景中，「近年國人憤華夏之不競，百事更張，而文學亦有啟蒙之運動。使之由個人事業一變而為人人之公器」，<sup>70</sup>他指出此應肯定。但在他看來，「驚新者」(指新文學家)「立新舊之說，以相號召」，「是今而非古，譽西而毀中」，走向了錯誤的方向；有鑑於此，「抱隱憂者」(指學衡派)「遂揭人文主義，則古稱先，自孔孟以下，

<sup>67</sup> 溫徹斯特原書共九章，譯本並非全譯。譯本未譯原書第七章詩歌，〈譯例〉稱：「論詩一章，定義則意少而辭多，韻律不合國情，體別又病其簡略。以為此章本非作意所在。……因法然刪去。」而於書末附載吳宓〈詩學總論〉以代之。譯本遇原本所舉作品例證，每有改易以中國作品者。其〈譯例〉云：「原書於重要處，輒徵之以例，或舉篇名，或引章句，所以顯意旨正觀念也。……恐譯之不足達其意，而轉失例證之用，因取諸本國文學以代之。……按原著中典例，每於譯文中易以本國之類似者，嚴復氏已為先河。蓋因國人於西方學術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國材料，為人人所共曉者，非欲擅改原著，乃不得已耳。」此早期譯介西方學術著作之獨特現象，參見馬睿：〈作為文學選擇與立場表達的西學中譯——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中譯本解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頁 49-57。

<sup>68</sup> 根據著者序，此書乃為大學教學之用而編寫，作者欲尋簡明介紹文學要旨及評價基礎 (compendious statement of the essentials of literature and the grounds of critical estimate) 之書而未果，遂自己寫了此書。此類概論性書籍，日本稱作「文學概論」，此一術語輸入中國，成為中文學術術語。

<sup>69</sup> 劉文翻：〈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頁 2：「未始不可謂中等以上學校之良教本。」又佚名：〈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學衡》第 28 期 (1924 年 4 月)，附錄，頁 1：「此書用作中等學校以上教本，甚宜。自修者讀之亦可獲益。」

<sup>70</sup> 劉文翻：〈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頁 1。

及蘇格拉底、柏拉圖與近世之安諾德、白璧德之說，咸津津樂道」。<sup>71</sup>新文學家反傳統與崇西方，而學衡派則折衷於古今中西。劉文翻援引溫氏此書為據，從六個方面批評新文學觀念及其崇尚的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與寫實主義，而論證人文主義文學觀念的合理性。明乎此，再看《文學評論之原理》的〈譯序〉：「嘗讀溫氏此書，喜其擘肌分理，惟務折衷，平理若衡，照辭如鏡，亟亟與同學相稱道，以其可為國人理論之則而拯其狂悖也。」<sup>72</sup>其借《文心雕龍》語稱溫氏理論「折衷」云云正符合學衡派的立場，而「狂悖」云云則指新文學家：「今之君子，黨朋而伐異，嗜奇而憚正，稍得一二，便操斤斧，肆其狂蕩之說，以騰於報章雜誌。」<sup>73</sup>這也能夠見出何以梅光迪教授文學概論而以此書為教材，而且任校譯之責。

早期輸入西洋文學批評過程中，文學批評的分類甚受關注。1921年，胡愈之〈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共介紹九種：歸納的批評（Inductive criticism），推理的批評（Speculative criticism），判斷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自由或主觀的批評（Free or Subjective criticism），科學的批評（Scientific criticism），倫理的批評（Moral criticism），鑑賞的批評（Appreciative criticism），審美的批評（Aesthetic criticism），印象的批評（Impressive criticism）。1923年，賀麟翻譯了美國 Erle W. Clippinger 的〈文學批評〉，列五種批評方法：解釋的批評（Interpretative Criticism）、審判的（譯者附注：或譯判斷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印象的批評（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傳記的批評（Biographical Criticism）、哲學的批評（Philosophical Criticism）。<sup>74</sup>1924年，胡夢華發表〈文藝批評概論〉，<sup>75</sup>分諸家之文藝批評觀念、文藝批評之意義目的與方法兩節介紹西方文學批評，所列批評方法六種：考訂的，歷史的，比較的，解釋的，訓誨的，唯美的，並做了簡要的解說。《文學批評與批評家》（1924）所載〈安諾德〉一文，介紹三種批評方法：「文學批評的方法大概可分為三種：一名裁判法，一名印象法，一名歷史法。」<sup>76</sup>

<sup>71</sup> 劉文翻：〈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頁1。

<sup>72</sup> 同上註，頁9。

<sup>73</sup> [美]溫徹斯特（Caleb Thomas Winchester）著，景昌極、錢堃新譯：《文學評論之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頁1。

<sup>74</sup> 賀麟：〈文學批評〉，《石室學報》第3期（1923年12月），頁65-67。

<sup>75</sup> 胡夢華：〈文藝批評概論〉，頁96-101。

<sup>76</sup> 《東方雜誌》社編：《文學批評與批評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頁88。

1925年，傅東華譯蒲克（Gertrude Buck，1871-1922）《社會的文學批評》（一）在《小說月報》發表，提出科學的文學批評、歷史的文學批評、演繹的文學批評、歸納的文學批評、比較的文學批評、賞鑑的文學批評、印象的文學批評、審美的文學批評、社會的文學批評，共九種批評方法。<sup>77</sup>這些文學批評方法的分類為研究中國文學批評者所借鑑，陳鐘凡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共列十二種批評方法，羅根澤在此基礎上再有加增，共列十三種文學批評方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借鑑西洋文學批評的方法對中國傳統詩文評的批評方式進行分類。

在輸入西洋文學批評方面，日本實早於中國。日本學者介紹西洋學說，編成「文學概論」。1920至30年代影響中國學界最大者乃本間久雄（1886-1981）《新文學概論》。其名「新文學概論」者，乃是區別於已有的文學概論。早在明治39年（1906），太田善男（1880-?）已出版《文學概論》。此書所援引西洋文學理論如安諾德（Arnold, M.）、愛默生（Emerson, R.W., 1803-1882）、龐科士（Pancoast, H.S., 1858-1928）、溫徹斯特（C.T. Winchester）等人學說，其書上編「文學總論」，總論文學的各方面問題；下編「文學各論」，分論各種文體。《新文學概論》初版於大正6年（1917），<sup>78</sup>分前後兩編，前編「文學通論」，後編「文學批評論」，乃據西方文學批評最新書籍編撰而成。據〈原序〉云，前編部分主要來源有亨特（Hunt）的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溫徹斯特的《文學批評原理》，其後編主要依據蓋雷（Charles Mills Gayley, 1858-1932）和斯各脫（Fred Newton Scott, 1860-1931）的《文學批評的方法及材料》。<sup>79</sup>大正15年（1926），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的增訂本出版，此版由原來的前後兩編改為四編，易名《文學概論》，由東京堂書店刊行。譯者章錫琛（1889-1969）早在1919年即開始翻譯《新文學概論》，初以文言譯出，1920年分章刊登在《新中國》雜誌，前編刊完，雜誌停刊。1924年遂以白話重譯，其後編「文學批

<sup>77</sup> 〔美〕蒲克（Gertrude Buck）著，傅東華譯：〈社會的文學批評〉，《小說月報》第16卷第6號（1925年6月），頁1。

<sup>78</sup> 由東京新潮社刊行，〔日〕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東京：新潮社，1917年）。

<sup>79</sup> 按此書全名《文學批評方法與材料導論：美學及詩學基礎》，*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Bases In Aesthetics and Poetics*，另有Gayley and Benjamin Putnam Kurt *Lyric, epic and allied forms of poetry*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20)，為Gayley與Benjamin Putnam Kurt合著。

評論」在文學研究會主辦的《文學》週刊（自 1924 年 7 月 132 期起）連載。1925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sup>80</sup>章錫琛又於 1927 年翻譯增訂本《文學概論》，到 1930 年 3 月完成，由開明書店出版，到 1936 年已出六版。《新文學概論·譯者序》說：「我國研究文學的風氣，近來可說大盛，但關於文學概論這一類研究文學的入門書籍，幾乎可說沒有。」<sup>81</sup>此書的翻譯乃是從日本轉輸入西洋文學批評，對傳播新文學觀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周全平《文藝批評淺說》（1927）：「我們中國底近代文藝，還正在萌芽的時代，所以我們要講到文藝批評，便不能不介紹歐洲近代底文藝批評來作我們底參考。……日本雖未能如歐洲之創始了新的批評論，然而他們底研究已把歐洲這些散漫的各派的學說作成一個較有條理的醒目的系統了。」<sup>82</sup>此指出日本學者在介紹西洋文學批評著作方面的特殊作用，即將西洋理論加以條理化與系統化，為中國學者提供瞭解之便利。

### 三、整理國故與中國文學批評

按照胡適對於新文化的規畫，一方面是「輸入學理」，另一方面是「整理國故」，以「再造文明」。整理國故「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sup>83</sup>「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重新估定一切價值」。<sup>84</sup>整理國故，所依據的正是輸入的學理。胡適稱「我十分相信『爛紙堆』裏有無數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也不過如此』」。<sup>85</sup>這是他對國故的整體估價。

<sup>80</sup> 王向遠：〈中國現代文藝理論和日本文藝理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4 期，頁 68-75、傅瑩：〈外來文論的譯介及其對中國文論的影響——從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譯本談起〉，《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6 期，頁 85-90，對《新文學概論》的內容、翻譯出版有介紹，後文較詳。然作者對本間久雄原著《新文學概論》與《文學概論》之關係未能闡明。

<sup>81</sup> 《新文學概論》卷首 1925 年 3 月〈譯者序〉載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6 年 2 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6 年臺 1 版改署章錫光譯，刪去譯者序，又據〈譯者序〉，汪馥泉曾譯《新文學概論》在《民國日報》之《覺悟》上刊出，此本未寓目，參〔日〕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新文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年；1926 年），頁 1-2。

<sup>82</sup> 周全平：《文藝批評淺說》第 1 章「緒言」，頁 6。

<sup>83</sup>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全集》第 1 卷，頁 691-700。

<sup>84</sup>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同上註第 3 卷，頁 147。

<sup>85</sup> 同上註，頁 146。

浩徐評價整理國故的意義云：「民國七八年那時候是中國人初次對於西洋文明開了眼睛的時候，那時候中國人雖然讚美西洋文明，但是還不曾從西洋文明的立腳點來看察過中國文明。」<sup>86</sup>整理國故的立腳點正是西洋文明。鄭振鐸〈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1923）稱：「我主張在新文學運動的熱潮裏，應有整理國故的一種舉動」，「因為舊的文藝觀念不打翻，則他們對於新的文學，必定要持反對的態度」。要打翻舊的文學觀念，一方面要「把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詩以及其他等等的文學原理介紹進來」，另一方面更要依據引進的原理，「指出舊的文學的真面目與弊病之所在，把他們所崇信的傳統的信條，都一個個的打翻了」。<sup>87</sup>以西洋文學觀念整理中國傳統文學，推翻舊的文學觀念，以為建立新文學的支持，這是新文學家的基本立場。

參與到整理國故中者並非都持新文學家同樣的價值觀與目的，即彰顯傳統觀念的弊病，證明新文學觀之正確，但主流的思想確乎是借鑑西方的學理研究古代傳統。即便是國粹派之主張「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也並不排斥西方的學理與方法，<sup>88</sup>只是目的與價值觀不同。〈國粹學報略例〉（1905）云：「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sup>89</sup>國粹派的前提是肯定中國傳統學術的價值，西方的學理與方法乃是用來「證明中學」。1919年，國粹派在北京大學成立《國故月刊》社，推劉師培為社長，<sup>90</sup>雖易國粹為國故，名稱上價值中立，然根本立場未變。國粹派與新文學派儘管文化立場不同，但在知識與方法層面存在共識，可以溝通。梁實秋〈文學與科學〉（1934）：「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真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這運動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西洋文學觀念的引進。」「五四以來西洋作品之翻譯介紹，在在均足以使我國青年耳目一新，儘量的不知不覺的接受了西洋文學的觀念。向之研究中國文

<sup>86</sup> 浩徐：〈主客答問〉，《現代評論》第5卷第106期（1926年12月），頁9，附載《胡適全集》第3卷，頁155。

<sup>87</sup> 見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83。

<sup>88</sup> 光緒31年（1905），《國粹學報》館編：《國粹學報》第1期（1905年1月），無頁碼。

<sup>89</sup> 同上註。

<sup>90</sup> 關於《國故月刊》社，參見陳平原：〈「少年意氣」與「家國情懷」——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載2010年5月4日《光明日報》，收於陳平原：《做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27-139。

學的至是亦不得不採取西洋的眼光。」「中國的整個文壇如今差不多完全受西洋文學洗禮了。」<sup>91</sup>

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就文學批評而言，乃是要以輸入的西方文學理論為指導整理中國傳統的詩文評。朱光潛（1897-1986）〈中國文學之未開闢的領土〉（1926）稱：「我們第一要務就是鼓吹文學獨立」，「獨立之後，應分門別類，作有系統的研究」，<sup>92</sup>「中國文學在創作與批評兩方面，都有許多待開闢的領土。在整理國故的呼聲很高的時候，應該早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作一個通盤計算」。朱光潛主張「把批評看作一種專門學問」。「中國學者本亦甚重批評。劉彥和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批評學方面，都是體大思精的傑作，不過大部分批評學說，七零八亂的散見群籍。我們第一步工作應該是把諸家批評學說從書牘節記，詩話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論語》中孔子論《詩》，《荀子·賦篇》，《禮記·樂記》，《子夏詩序》之類——搜集起來成一種批評論文叢著。於是再研究各時代各作者對於文學見解之重要傾向如何，其影響創作如何，成一種中國文學批評史。」<sup>93</sup>

王伯祥嘗試運用文學進化論從歷史文獻目錄論證中國批評的產生與演化。〈歷史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1926）「文學的演化，正和別的事物一樣，都不能自外於自然發展的原則」，中國文學的演化到兩漢，「文壇的體制便日趨於繁密」，「所以比較抉擇，各本自己的主張，用為取捨的標準，而批評的論著便應時發生了」，《典論·論文》是「這時代使命中的第一個奉行著」。<sup>94</sup>自此以後，注意批評的人漸多，但多是單篇零什，而劉勰《文心雕龍》與鍾嶸《詩品》則是勒成專著，其後專書競出，體例亦異。王氏歸納為五種體例：

- （一）《文心雕龍》——推究文體的源流，評論它們的工拙。
- （二）《詩品》——排比作者的高下，追溯他們的師承。
- （三）皎然《詩式》——備陳作詩的方法和格律。

<sup>91</sup> 梁實秋：〈文學與科學〉，頁 432。

<sup>92</sup> 朱光潛：〈中國文學之未開闢的領土〉，《朱光潛全集》第 8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142，此文 1926 年原刊載於《東方雜誌》第 23 卷第 11 號（1926 年 6 月），頁 81-88。

<sup>93</sup> 同上註，頁 142-143。

<sup>94</sup> 王伯祥：〈歷史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文學週報》第 224 期（1926 年 5 月），頁 444-445。

(四) 孟榮《本事詩》——旁采故實來說明詩中的本事。

(五) 歐陽修《六一詩話》、劉攽《中山詩話》——因詩見事，或因事引詩。<sup>95</sup>

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1927)認為，自〈文賦〉起，「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除了《文心雕龍》、《詩品》等若干部略成統系的文學批評專著外，古代的詩話、文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算不上是科學研究。鄭振鐸列出「中國文學整理」的八個方面，「批評文學」即其中之一類。鄭氏主張用現代文學觀念和科學方法整理一般批評、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等文學材料，<sup>96</sup>其〈中國文藝批評的發端〉(1931)梳理了先秦到魏晉時代的文學批評。<sup>97</sup>

早在中國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前，日本漢學家已經以西方學術觀念整理中國傳統學術，因而當中國整理國故之聲起，日本漢學被作為先行者輸入到中國。孫俚工(1894-1962)是日本漢學的重要譯介者，他翻譯鈴木虎雄(1878-1963)《支那詩論史》、鹽谷溫(1878-1962)《支那文學概論講話》、<sup>98</sup>本田成之(1882-1945)《支那經學史論》、<sup>99</sup>兒島獻吉郎(1866-1931)《支那文學考》與《支那文學雜考》。<sup>100</sup>孫俚工將這些漢學著作視為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學術的範例，其在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考》(《中國文學通論》)之譯序(1935)中云：「日本底漢學家，歷代以來，史

<sup>95</sup> 王伯祥：〈歷史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頁445。

<sup>96</sup> 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第17卷號外上冊(1927年6月)，頁1-20。

<sup>97</sup> 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頁67-82。

<sup>98</sup> [日]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1919年)，孫俚工譯，書名改題《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

<sup>99</sup> 昭和2年，[日]本田成之：《支那經學史論》(京都：弘文堂書房，1927年)，孫俚工譯，改題《中國經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

<sup>100</sup> 兒島獻吉郎著《支那文學考》2編，第1編散文考，大正9年(1920)東京目黑書店出版；第2編韻文考，大正11年(1922)目黑書店出版，孫俚工譯其兩編，改名《中國文學通論》上卷，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孫譯又有《中國文學通論》下卷，係譯自[日]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雜考》(東京：關書院，1933年)，此書共十篇，孫譯前八篇，第九篇予之倫理觀、第十篇予之文章觀，因與中國文學無直接關係，略去未譯，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支那文學雜考》又有胡行之譯本，改名《中國文學研究》，北新書局1936年出版。按：著者有《支那文學概論》，昭和3年(1928)東京京文社出版，胡行之中譯，北新書局1930年出版；隋樹森中譯，書名《中國文學》，1931年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1933年再版，改題《中國文學概論》。

不絕書。……近代歐學東漸，日本漢學亦受了科學的洗禮，一時如古城貞吉、宇野哲人、鹽谷溫、青木正兒、鈴木虎雄、本田成之、兒島獻吉郎等，都以科學底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哲學、文學、史學，見於著述，覃思精慮，條理明晰，其對於漢學之功實偉。」<sup>101</sup>此種看法在當時頗具代表性，也是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漢學著作被大量譯介到中國的重要動因，對中國學術界之整理國故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日本近代漢學之於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以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最為著名。此書由三篇長文構成，即〈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1911-1912），〈周漢諸家關於詩的思想〉（1919），〈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1919-1920），先後刊載於《藝文》雜誌。<sup>102</sup> 1925 年結集成書，由弘文堂書店出版。三篇論文的論述對象並不完全統一，其〈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一篇已溢出詩論範圍，此亦可見作者的研究逐漸由詩論擴展到整個文學論。根據作者自序（1924），其書因主要論詩，故不題《支那文學論史》，擬補充後，再改題《支那文學論史》。所謂文學論史者，實即文學批評史。鈴木氏的自序表明，他已自覺地進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而且有了整體的規畫，從較寬泛的意義上說，其《詩論史》亦可謂一部文學批評史著作。<sup>103</sup> 孫俚工將其前兩篇譯成中文，<sup>104</sup>以《中國古代文藝論史》為名，1928 年由北新書局出版。譯者後又譯其第三篇，作為《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卷下，由北新書局 1929 年出版。

<sup>101</sup> [日]兒島獻吉郎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通論》上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2，卷首譯者〈序〉。

<sup>102</sup> 明治 44 年（1911），[日]鈴木虎雄：〈格調・神韻・性靈の三詩說を論ず〉，《藝文》第 2 卷第 7、8、9、10 號（1911 年 7、8、9、10 月），頁 17-42、頁 44-77、頁 98-127、頁 49-71，明治 45 年（1912），第 3 卷第 2 號（1912 年 2 月），頁 86-108；大正 8 年（1919），〈周漢諸家の詩に對する思想〉，《藝文》第 10 卷第 1、2 號（1919 年 1、2 月），頁 22-42、頁 1-19；大正 8 年，〈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藝文》第 10 卷第 10、11、12 號（1919 年 10、11 月），頁 1-12、頁 38-53，大正 9 年（1920），第 11 卷第 2、3 號（1920 年 2、3 月），頁 67-77、頁 16-34。

<sup>103</sup> 關於此書之於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學術史意義，參見蔣寅：〈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敘述框架的形成——尤以明清三大詩說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2 期，頁 38-47。

<sup>104</sup> 孫俚工，湖南寶應人，北京高等師範畢業，留學日本，在上智大學修習德國文學。見內田泉之助昭和 3 年（1928）〈序〉，[日]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頁 8。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漢學家與中國新文化運動主流對於中國文學傳統的態度差異。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序言》對中國傳統文學推崇備至，稱中國是「文學的古國」，「漢唐之世，尊崇儒道，獎勵文教，濟濟多士，翱翔翰苑，吟詠風月，發揮詩賦文章之英華；及元明以降，戲曲小說勃興，國民文學則出不朽之傑作；就中推漢文、唐詩、宋詞、元曲為空前絕後」，「作家之數，篇什之量，以及年代之久遠，種類之豐富，世界文學未見其比」。<sup>105</sup>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考·序》：「中國文學過去享有數千年之壽命，將來庶亦可保其不滅之生命。」<sup>106</sup>這種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肯定態度與國粹派接近，而與宣稱舊文學是死文學的新文學家相背離。孫俚工翻譯日本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持的是新文學家的立場。其《中國古代文藝論史》譯序稱：「中國人崇古的心實太利害（按：厲害）了，無論什麼只是『古已有之』的就是好的；無論什麼只是『古已有之』的就是對的。」鈴木虎雄則「稱讚古人底好處，同時也指出古人底壞處：這種態度都是不輕易發現於中國底學者腦中的」，他翻譯此書，是要「使讀者讀完以後也能覺著中國古代對於文藝的思想是『不過如此』的一種東西」。<sup>107</sup>「不過如此」是套用胡適語，可見孫俚工將日本學者的漢學著作放到中國整理國故的脈絡中，言其價值。在孫俚工看來，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學方面走在中國學者的前面：「在日本對於中國文學底研究的著作，實在不只這一部。如《支那文學研究》（本書著者鈴木）、《支那文學史》（古城貞吉）、《支那大文學史》（兒島獻吉）、《支那文學史綱》（全上）、《支那文學考》（全上）、《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鹽谷溫）、《支那小說戲曲概說》（宮原民平）和最近刊行的《支那文學大綱》等都是近代有系統的大部著作，可見日本對於中國文學底研究是盡過了相當的能力的了。然而反觀我們國內底著作界又怎樣呢？口口聲聲高唱著整理國故保存國粹的口號，但數年的時間過去了，成績究在什麼地方呢？怕只有慚愧可告人罷。」<sup>108</sup>此可見孫氏對於中國學界整理國故現狀的不滿，他之翻譯日本學者的漢學著作，即希望以日本學者的研究為典範，推動中國國故的整理運動。其《中國文學通論》之

<sup>105</sup> [日] 鹽谷溫著，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序言〉，頁 1-2。

<sup>106</sup> [日] 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考》第 1 編（東京：目黑書店，1920 年），頁 1。

<sup>107</sup> [日] 鈴木虎雄著，孫俚工譯：《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序言》（上海：北新書局，1928 年；1929 年），頁 2-4。

<sup>108</sup> 同上註，頁 4-5。

譯序稱：「我不希望這部書出版，成為研究中國文學者底權威，只希望這種分析綜合的方法應用到中國文學上去，使中國文學因此而得到一番大大的整理。」<sup>109</sup>

#### 四、第一部中國詩學專著：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

楊鴻烈（1903-1977）《中國詩學大綱》是第一部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詩學的著作。<sup>110</sup>楊氏自1922年起即發表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論文，<sup>111</sup>由於能夠閱讀英文原著，故他可以直接援引西洋文學批評作為整理中國文學批評的依據。楊氏最服膺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一書。其〈中國文學觀念的進化〉（1924），即以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說闡述中國文學觀念。楊氏稱：「我是深受他的影響的人，所以應用這個進化原理來解說中國古今書裏所有的文學定義，使讀者知道文學觀念的正確的程度，與一時代一作家的文藝品有很密切重大的關係。」<sup>112</sup>「最崇信摩爾頓（Richard Green Moulton）在《文學的近代研究》所說的：普遍的研究——不分國界，種族；歸納的研究，進化的研究」。<sup>113</sup>楊鴻烈原欲撰寫文學概論，踐行摩爾頓之說，因準備未足，遂改撰《中國詩學大綱》，雖非跨越國界的普遍的研究，但其文學觀念卻是普遍性的，即相信普遍的文學理論。正是在此一觀念基礎上，其才可以直接以西方詩學論述中國詩學；至於進化的觀念與歸納的方法則是貫串在其論述中。

《中國詩學大綱》自1924年9月開始在《文學旬刊》連載（第48期起至1925年第73期），至1928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自序〉（1924）云：「我這本書是把中國各時代所有論詩的文章，用嚴密的科學方

<sup>109</sup> [日] 兒島獻吉郎著，孫徂工譯：《中國文學通論》上卷，頁2，卷首〈序〉。

<sup>110</sup> 楊鴻烈1919年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後轉入英語部，1925年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啟超，從事法律史研究，1934年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博士學位。楊鴻烈歷任上海中國公學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師範學院院長、河南大學歷史系主任等，其《中國法律發達史》等是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權威著作。

<sup>111</sup> 參見張健：〈純文學、雜文學觀念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80-91。

<sup>112</sup> 楊鴻烈：〈中國文學觀念的進化〉，《京報副刊》第3版第1號，1924年12月5日，又載楊鴻烈：《中國文學雜論》（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頁175-176；參見同上註，頁80-91。

<sup>113</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頁4。

法歸納排比起來。」<sup>114</sup>此正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主張在中國文學批評領域的具體實踐。這位時方 22 歲的青年學者對自己的著作非常自信，自稱「最小限度，總可使讀者於中國各時代詩學家的主張有系統的和明澈的瞭解」，他將自己整理詩學與王國維、魯迅整理戲曲、小說相比，「我以為中國已有關於戲劇的材料，已有王國維先生理出個頭系，小說也有周樹人和其他諸先生整理爬揚過；只有詩歌現卻落在我的手裏，成就怎麼樣，就要靠讀者的評判」；雖然自言「絲毫沒有把握」，<sup>115</sup>但這種自謙掩飾不住他的自信，因為將自己的著作與王國維、魯迅放到一起比較就已經顯明了態度。現在看來，此書從觀念、方法到架構皆套用西方學術著作，對中國詩學傳統缺乏足夠的內在理解，學術價值不足，但其學術史的價值卻值得重視，作為以西方文學批評觀念與方法整理文學批評的早期探索，以及中國學術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案例，其得失仍值得總結與借鑑。

楊鴻烈在書中提出文學批評研究的兩種方式，即橫的原理研究與縱的歷史研究。楊氏本人的《中國詩學大綱》屬於前者，但他試圖在整體的橫的系統架構中包含縱的歷史敘述。其〈自序〉說：「本書雖是橫的——原理的研究，而徵引例證，卻是隱隱的按著時代的先後排比起來，……又差不多是縱的——詩的原理的歷史的研究。」<sup>116</sup>此兩種研究方式正是現代學者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方式，朱自清又稱作「橫剖的」、「縱剖的」。<sup>117</sup>朱自清《詩言志辨》、傅庚生《中國文學批評通論》是橫的原理的研究，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等人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是縱的歷史的研究。

楊鴻烈研究中國詩學原理，首先要回答「中國有不有詩學原理」，而這一問題成立的前提是「詩有不有原理」。<sup>118</sup>楊氏所謂「詩學原理」乃 Poetics，是西方學術的含義，包括詩的性質、起源、構成、分類、功能、評價等。此兩者今天看來不成問題，然在當時卻與中國有無文學批評的疑問密切相關，乃非常嚴肅且必須回答的學術問題。楊氏提出此問題與胡適的質疑直接相關。據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胡適曾與楊談話，稱：「在外國學校裏研究文學的，並沒有『文學概論』這一種科目，因為那些所謂的文學原

<sup>114</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頁1-4。

<sup>115</sup> 同上註，頁1-4。

<sup>116</sup> 同上註，頁3。

<sup>117</sup> 張健：〈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朱自清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頁61-65。

<sup>118</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8。

理，不過是些批評家弄出來的把戲，而批評家都是做不出好的東西來，要是聽了他們的話去賞鑑文家作品，就是上大當！尤其是詩，你想怎樣可以使它原理化（theorize）？」<sup>119</sup>按照胡適的說法，文學無原理，詩亦無詩學，楊鴻烈要整理中國詩學，便首先要面對胡適的觀點。楊氏先稱「適之先生的話，在某種情形之下，是確鑿不移的」，於是引證《文心雕龍·知音》篇「篇章雜選，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的話以證胡適所言有理。<sup>120</sup>但此後則筆鋒一轉說，「不過詩的原理的內容，卻不只是定下一個標準來衡量詩的長短好壞批評一方面」，這一方面乃是莫爾頓所謂「審判的（或譯判斷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的特徵，即用一種假定的原則衡定各殊的文學（the application of assumed principles to the assaying of particular literature），<sup>121</sup>這是胡適所理解的原理。楊鴻烈指出，自己所說的原理是建立在科學方法基礎之上的。「我們很可以用客觀的科學方法，來分析一般詩的組合的成分，因其成分性質的不同，即可以區別它的種類，更可因此追究詩在人的心理上的要求，和歷史上的起源的時代，然後詩在我們情志方面的影響和功效如何，我們藉此就可以判斷詩的真實的價值，把這些種種步驟，『按部就班』的做完了，那麼詩的特性就可彰著顯明的表示出來。」<sup>122</sup>這種探求詩歌原理的方法就是莫爾頓所謂文學的近代研究特徵之一的「歸納的觀察（Inductive observation）」。

這種建立科學方法基礎上的原理，按照楊鴻烈引述亞丹姆士（John Adams）《教育原理的演進》（*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的說法，「原理畢竟不過是實習的合理的方面」（Theory after all is only the rational aspect of practice），而不是假定的原理。在這種意義上，楊鴻烈認為，詩是有原理的。楊鴻烈指出，在歐洲，「那所謂的『詩學原理』（Poetics）有的很早，並且很多」。<sup>123</sup>

在確認詩有原理之後，楊鴻烈再回答中國有無詩學（Poetics）。事實上朱光潛 1942 年還在回答此一問題，其《詩論·抗戰版序》說「中國向來只

<sup>119</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晨報副刊·文學旬刊》第 1 版第 49 號，1924 年 10 月 5 日，又收於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 4。

<sup>120</sup> 同上註。

<sup>121</sup> Richard B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p. 222.

<sup>122</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 4。

<sup>123</sup> 同上註，頁 4。

有詩話而無詩學」，<sup>124</sup>即認為中國無 Poetics。楊氏《大綱》第一章〈通論〉即回答此一問題。他以西方詩學的標準審查中國傳統的論詩著作，得出結論：「中國千多年前就有詩學原理，不過成系統有價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們做詩學原理研究的材料。」<sup>125</sup>楊鴻烈認為，嚴羽（?-1245）《滄浪詩話》、范德機（1272-1330）《木天禁語》、徐禎卿（1479-1511）《談藝錄》、葉燮（1627-1703）《原詩》「有建設『詩學原理』的意思」，但也並非「完全純美」，並不可以「和歐美詩學的書籍相抗衡」。要整理中國詩學，「絕對的要把歐美詩學書裏所有的一般『詩學原理』拿來，做說明或整理我們中國所有豐富的論詩的材料的依據」。<sup>126</sup>按照楊鴻烈的文學觀念，歐美「詩學原理」具有普遍性，同樣適用於中國詩學。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中國詩學，就是以西方的普遍的詩學原理為依據，整理中國詩學材料。西方詩學原理有其問題及其理論架構，組合成分、種類、起源、功效、價值等，就是西洋詩學原理的問題及架構，整理中國詩學就要把中國詩學材料按照西洋詩學的問題分類，放到其理論架構中。如此整理便是其所謂科學的方法。

《中國詩學大綱》全書共九章，分別為：通論，中國詩的定義，中國詩的起源，中國詩的分類，中國詩的組合的原素，中國詩的作法，中國詩的功能，中國詩的演進，結論——著者對於新詩人的罪言。第一章論證中國有詩學原理之後，第二章便給詩下定義，先給研究對象下定義，這是當時西方文學批評著作的普遍做法。按楊氏此章論述方式也受西方著作影響。此章提及文齊斯得（溫徹斯特，C. T. Winchester）《文學批評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Criticism*）關於詩的定義的論述，<sup>127</sup>見於溫徹斯特著作之第七章詩歌。溫氏此章先評述前人各種說法之得失，然後自下一詩的定義：詩歌乃文學形式之一，其目的在訴諸情感，而以韻律形式寫出（Poetry is that form of literature whose purpose is to appeal to the emotions, and which is written in metrical form）。<sup>128</sup>楊鴻烈的論述方式大體效法溫徹斯特。楊氏

<sup>124</sup>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3卷，頁3。

<sup>125</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4。

<sup>126</sup> 同上註，頁31。

<sup>127</sup> 同上註，頁46。所引溫徹斯特論述見，Caleb Thomas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pp. 227-228。

<sup>128</sup> Caleb Thomas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p. 232。

先歸納中國歷代關於詩的定義為二十七種，如詩是言志的表現，詩是持人性情的，詩是承人性情的等等。在條列各種說法之後，分別加以評論。關於詩言志，著者列舉《毛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評論云：「就是發於情感的『志』，但純文學都是以情感為惟一絕對不可少的原素，這樣將何以從『戲曲』『小說』裏來區別詩呢？」因而斷定「這個定義沒有採用的價值」。<sup>129</sup>又如評朱熹「詩者，人心之感於物而形於言之餘也」說：「和他種純文學的界限仍然相混。」<sup>130</sup>在檢討古代諸說之後，楊鴻烈又總括古人定義之缺點有四：詩的定義與一般文學的定義分別不清，列舉詩的特點偏而不全，不顧詩的本體而以詩的作用和意味為定義，不是詩的定義而為定義。著者根據蓋耶勒（Gayley）、司克特（Scott）《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材料》（*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關於詩之定義的三個必要條件：所鋪陳的材料（the subject of treatment），發表的形式（the form of expression），慘澹經營構思時的歷程（the process of execution），自己給詩下定義：「詩是文學裏用順利諧合帶音樂性的文字和簡煉美妙的形式，主觀的發表一己心境間所感現，或客觀的敘述描寫一種事實而都能使讀者引起共鳴的情緒。」<sup>131</sup>

第三章討論中國詩的起源，在當時學術界流行的文學起源論，分心理的起源與歷史的起源兩方面。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第三章文學的起源即是如此。中國學者介紹文學起源，也是如此。如秋原〈文藝起源論〉（1928）介紹文藝起源論，分心理學、生理學的見地，與歷史發生學的社會學見地兩方面。<sup>132</sup>楊鴻烈討論古代的詩歌起源說也分心理與歷史兩個方面。關於詩的心理起源說，實分兩個層次，（一）古代從心理的情感說明詩的起源諸說，包括《毛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說，《漢書·藝文志》「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說，韓愈〈送孟東野序〉「不平則鳴」說等；（二）引起情感的原因，此又分為二，一是人事引起情感，如鍾嶸《詩品·序》「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等，二是自然引起情感，如《文

<sup>129</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36。

<sup>130</sup> 同上註，頁39。

<sup>131</sup> 同上註，頁45-47。

<sup>132</sup> 秋原：〈文藝起源論〉，《北新》第2卷第22期（1928年10月），頁33-57，文末亦言及中國傳統文評中的心理起源說。

心雕龍·物色》等。<sup>133</sup>關於詩的歷史起源說，楊鴻烈稱這方面「只簡簡單單的去找出那最先寫成文字的詩是哪幾首？在什麼時代？寫詩的人是一個還是多個」，<sup>134</sup>楊氏列舉了傳統關於最早詩歌的說法，如鄭玄〈詩譜序〉的起於虞舜說等，加以討論。

第四章詩的分類，「將中國從古代以來詩的分類，逐一的加以評判，然後舉出他們的共通缺點，又把歐美最有科學精神的詩的分類法引用來參酌情形，定出一個詩的分類大綱」。<sup>135</sup>本章先討論中國傳統的分類方法，比如論《詩經》的六義，《滄浪詩話》的詩體的分類等，其共通缺點是「複雜冗選」、「殘缺不全」。楊鴻烈再轉向討論歐美的分類，認為哈得遜（W. H. Hudson）的二分法，即分為「主觀的詩（Subjective poetry）」與「客觀的詩（Objective poetry）」，「更能以簡馭繁，更合乎嚴密的科學分類的法則，並且刻意採用於我們中國詩的分類」。<sup>136</sup>

第五章中國詩的組合的原素，楊鴻烈分內容與外形兩方面，其所列內容原素：情感、想像、思想與形式，即溫徹斯特《文學批評原理》中所列的文學要素。其所列外形方面的原素有二，即文字與格律。在楊鴻烈看來，中國傳統的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都不是科學的分類」，而英國心理學家馬可竇（William McDougall, 1871-1938）《社會心理學·導言》以懼、惡、好奇、怒、自卑、自尊、慈愛七種原始的情緒，乃是科學的分類。楊鴻烈特別強調愛情在情感中的地位。<sup>137</sup>楊氏討論了古代詩論中關於文字與格律的各種說法，認為「千餘年來的詩逐漸的趨重形式格律方面」，認為胡適的白話詩主張「宣佈格律的死刑」。<sup>138</sup>

第六章中國詩的作法，將中國傳統關於詩的作法的論說歸為三類：性情說，學問說，性情學問相輔說。第七章中國詩的功能，指出歐美詩學家將詩的功能分為三類：生理的功能，心理的功能與倫理的功能，楊鴻烈將生理的功能歸併於心理的功能，然後將中國傳統的觀念分倫理的功能與心理的功能兩類加以討論。楊鴻烈認為，希臘原也「把道德當做詩人的分內

<sup>133</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 45-50。

<sup>134</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 51。

<sup>135</sup> 同上註，頁 71。

<sup>136</sup> 同上註，頁 92。

<sup>137</sup> 同上註，頁 142-143。

<sup>138</sup> 同上註，頁 167-168。

事」，自亞里斯多德將「詩的藝術的功效」與「教育的功效」區分開來，影響所及，「妨礙文藝創作的道德觀念的衰退」造成「歐洲詩歌的發達」。而在中國，由於「推崇詩的倫理的功能，把詩的本來的心理功能『喧賓奪主』的壓下去，所以偉大純粹的詩章就很難產生出來」。<sup>139</sup>

第八章中國詩的演進，楊鴻烈分「詩的退化說」與「詩的進步說」兩類敘述，關於前者，楊氏主要討論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章太炎認為，「本情性，限辭語，則詩盛；遠情性，喜雜書，則詩衰」，<sup>140</sup>詩歌史恰是由盛到衰的歷史。在楊鴻烈看來，章太炎主張詩的退化說，其錯誤在於「不知道這種詩的退化的趨勢，乃是人類『理智』進步，『感情』『想像』退滅的結果；這是自然的結果，並不是人為」。楊鴻烈「從詩的本質上和心理方面觀察」，「相對的」「部分的」「贊同章先生的這種說法」；但「從歷史進化的觀點看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詩是進步的」。<sup>141</sup>關於詩的進步說，楊鴻烈認為持此觀念者雖然「鳳毛麟角」，但其「有正確的歷史的進化觀念」，「最令人佩服」。楊氏所列持此觀念者有元稹、都穆、方苞、吳雷發、袁枚諸人，而以葉燮《原詩》的論述「所以是進步的原故」「最詳切明盡」。<sup>142</sup>

第九章結論——著者對於新詩人的罪言，乃是基於中國傳統詩學的考察對於新詩的評論。楊鴻烈稱其全書「拿全部精力來闡發詩的本質」，詩的形式雖「能增加本質之美」，卻處於「僕從、陪襯的地位」。按照楊鴻烈的觀察，新文學運動中白話詩的盛行，「詩體得空前的大解放」，但「缺乏詩的本質」，「言之無物」，這背離了胡適提倡白話詩的初衷。其《中國詩學大綱》的目的之一也是為救當今詩壇之弊。著者書末云：「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開創新時代的豪情溢於言表。<sup>143</sup>

儘管楊鴻烈充滿豪情與自信，將自己的這部著作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並提，但後兩者皆成為學術經典，獨楊著雖矚目當時，1928年1月出版，9月即再版，1930年3版，卻很快退出學者的

<sup>139</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215-216。

<sup>140</sup> 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30。

<sup>141</sup>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頁236。

<sup>142</sup> 同上註，頁238-239。

<sup>143</sup> 同上註，頁227。

視野。朱光潛、朱自清等研究中國詩論的著作中，都未見到此書的迴響。在今天看來，此書從觀點到方法再到著述的形式都套用西方同類著作，這種做法是不成功的。楊氏只是以西方文學批評的理論架構，將中國傳統詩論的材料放到這一架構中，站在西方詩學的立場上，以其標準來衡量評判，未能揭示中國詩學的內在特質，更未能呈現中國詩學的觀念架構。此書與傅庚生《中國文學批評》同是橫的原理研究的著作，兩者有共同的弊端，命運也相同，其因由值得深思。

### 五、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

1927年，陳鐘凡（1888-1982）《中國文學批評史》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文學批評史著作。此書與著者之《中國韻文通論》原合為一部，總名為《中國文學評論》，中華書局將其析為兩書，獨立印行。<sup>144</sup>

與楊鴻烈鮮明的新文學派的文化立場不同，陳鐘凡的文化立場更接近保守的國粹派與學衡派。陳氏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1914-1917），與新文學派及國粹派皆有交往，然其學術上與國粹派關聯更多，曾在國粹派的刊物《國故月刊》連載《諸子通誼》（1919）。陳鐘凡曾從學於陳衍，<sup>145</sup>陳衍《石遺室詩話》卷29亦提及其是考據家兼教育家。陳鐘凡亦曾在學衡派的大本營東南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其〈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1937）將整理國故追溯到清代漢學傳統，而將國粹派、新文學派之國故整理皆一併納入，而將其批評史放到整理國故的脈絡之中。此書卷末所列參考書目，有日本學者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sup>146</sup>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考》，<sup>147</sup>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也可以見出日本近代漢學的影響。

陳氏整理中國文學批評，要回答中國有無文學批評的問題。《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章中國批評史總述云：「文學評論，遠西自希臘學者亞里斯多

<sup>144</sup> 陳鐘凡：〈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學藝》第16卷第1號（1937年1月），頁7：「陳中凡昔著《中國文學評論》，以文學批評史弁其簡端：中華書局因分印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及《中國韻文通論》兩部。後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詳盡倍之，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益遠過之矣。」

<sup>145</sup> 陳衍卒，陳鐘凡：〈哭先師石遺老人〉，《書林》第2卷第4期（1937年8月），頁1。

<sup>146</sup> 此書先由陳彬龢節譯成中文，書名《中國文學概論》（北京：樸社，1926年）；孫俚工全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1929年開明書店出版。

<sup>147</sup> 此書孫俚工譯，改題《中國文學通論》，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德以來，訖於今日，已成獨立之學科矣；中國歷代雖無此類專門學者，然古人對於文藝，欣賞之餘，未嘗不各標所見，加以量裁。」<sup>148</sup>此實肯定中國有文學批評，但陳氏同時承認中國古代對於「批評」，「未能確認其意義」；<sup>149</sup>除《文心雕龍》、《詩品》為論文的專著，其餘論文著作如詩話詞話等「率零星破碎，概無統系可尋」。<sup>150</sup>其對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特徵的認識大體同於時人。中國有文學批評，這一判斷是其撰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觀念前提；中國傳統對文學批評之意義認識不清，不成系統，此是其以西洋文學批評為依據的學理前提。

陳鐘凡試圖為中國傳統的詩文評建立一個現代的學術觀念架構。其書第一章文學之義界，第二章文學批評，分別定義文學與文學批評，即先建立此一架構。其論述文學及批評觀念分「歷代」與「近世」，將中國觀念歸入「歷代」，而「近世」則專指西洋，表明其歷史觀念也同樣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不僅如此，其著述體例也受西洋著作影響，其先為研究對象下定義，此即西方著述體例。

陳氏定義文學，先述歷代文學之義界，再陳近世之定義。其述近世定義，當是樂栝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1925）而成。陳氏先引法國批評家佛尼（Vinet, 1794-1847）、英國批評家埃諾特（Matthew Arnold, 1822-1888）的文學定義，然後援引亨德（Hunt）《文學的原則和問題》之文學定義：「文學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現思想之文字也。」<sup>151</sup>稱其「精確」。諸說皆見於本間久雄氏著作，以亨德為精確亦同。<sup>152</sup>陳鐘凡評論說：「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知彼之所言感情、想像、思想、興趣者，注重內涵，此之所謂采藻、聲律者，注重法式。實則文貴情深而壯麗，故感情、采藻二者，兩方皆所並重。」<sup>153</sup>陳氏對於中西文學觀念的整體看法，即以西方重內容，中國重形式。其自定義云：「文學者，抒寫人類之想像、感情、思想，整之

<sup>148</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頁9。

<sup>149</sup> 同上註，頁6。

<sup>150</sup> 同上註，頁9。

<sup>151</sup> 原文：Literature is the Written Expression of Thought,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Feelings and Taste, in such an untechnical form as to make it intelligible and interesting to the general mind. 見 Theodore Whitefield Hunt,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p. 24。

<sup>152</sup> [日]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新文學概論》，頁3-5。

<sup>153</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5。

以辭藻、聲律，使讀者感其興趣洋溢之作品也。」<sup>154</sup>這一定義在他而言乃是欲兼有中西文學觀念之長，備及文學的內容、形式及美感功能。

文學批評乃從西方輸入之學說，欲以論述中國文學批評，必先介紹文學批評學說本身。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章「文學批評」分二節：（一）批評之意義，（二）批評之派別。其指出遠西學者言「批評」之涵義有五：指正、讚美、判斷、比較及分類、鑑賞。此說實源自蓋萊與施各德《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材料》之說，將「批評」一詞歷來的意義分為五類：1.指摘（Fault-finding），2.讚揚（to praise），3.判斷（to judge），4.比較（to compare）及分類（to classify），5.評賞（to appreciate），胡愈之〈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一文有介紹。陳鐘凡未有說明來歷，惟本章列有參考書書目三種：（一）Winchester'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溫徹斯特《文學評論原理》），（二）Moulton's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sup>155</sup>（三）Huds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哈德遜《文學研究導論》），並未列蓋萊與施各德之書，其說乃引自胡愈之氏文章。其「批評之派別」一節共列十二種批評方法，分別是：1.歸納的批評，2.推理的批評，3.判斷的批評，4.考訂的批評，5.歷史的批評，6.比較的批評，7.解釋的批評，8.道德的批評，9.審美的批評，10.印象的批評，11.欣賞的批評，12.科學的批評。陳氏所列這些批評方法從何而來？其本人亦未說明。按照一般著述體例，當以本章所列批評方法出自其所列三種英文參考著作，但事實並非如此。考陳所列批評方法並非直接從此三種英文書中來，而是來自上節所述胡愈之、胡夢華介紹文學批評的文章。

陳鐘凡所列第1種批評方法為歸納的批評，其解說云：「將各種特殊的文學，加以說明及分類也。」胡愈之文章亦列為第1種，並解釋此批評方法云：「把各種特殊的文學，加以說明和分類。」<sup>156</sup>按胡愈之解說乃譯自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原文為：Inductive Criticism: examination of particular literature as it stands, with a view to interpretation and evolutionary classification。<sup>157</sup>比勘可知，陳鐘凡之說非譯自莫氏原著，而是來自胡愈之

<sup>154</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6。

<sup>155</sup> Moulton 陳書錯排成 Maulton，或許是手民之誤。

<sup>156</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7；胡愈之：〈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頁76。

<sup>157</sup> Richard B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p. 222.

譯文，僅改口語詞為文言詞。第 2 種推理的批評，陳鐘凡解釋云：「借歸納所得之結論，建立文學上之原則及其原理也。」胡愈之亦列為第 2 種，解說云：「用歸納出來的結論，建立文學的原則和文學的哲學。」此條亦出莫氏，原文：Speculative criticism: working toward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按莫氏於上條「歸納的批評」之解釋後，有語云：「這是其他種類批評的必要基礎（this the necessary basis of the other types）。」<sup>158</sup>胡愈之解釋歸納的批評，亦有此句，故此處中譯「用歸納得來的結論」乃承上而出的意譯，以足文意。陳鐘凡解說相同，明顯來自胡愈之文。第 3 種判斷的批評，陳鐘凡解釋：「以前法所得之原則原理，估量各派文藝之價值，判斷其優劣也。」胡愈之：「用這種假定的文學原則，估量文學的價值，判斷文學的優劣。」<sup>159</sup>此條亦出莫氏，原文：Judicial Criticism: the application of assumed principles to the assaying of particular literature。胡文「估量文學的價值」以下乃意譯，陳說實抄胡文。

陳鐘凡所列第 4 至 12 種批評方法，均出自胡夢華的〈文藝批評概論〉。第 4 種為考訂的批評，陳氏解釋云：「訂正作者原著之謬誤，及別裁其真偽也。」胡夢華：「志在訂正作者原著之謬誤。」第 5 種歷史的批評，陳鐘凡云：「敘述作者之生平與其著述之關係，更推論作者之著作思想與其時代環境之關係；更旁徵其所受於前人、時人之影響，及家庭種族之薰陶，以資論斷，謂之歷史的批評。若僅綜合其時人之意見，參以己意，則非精審之批評者所敢取也。」胡夢華云：「敘述作者之生平，與其著作之關係，更從而推及作者之著作思想與其時代環境之關係，處於何種勢力之下，受何種思潮之影響，其著作思想乃由產生，復旁徵其所受於前人，時人，國家種族之薰陶為佐證，以資論斷。或僅綜合其時人之意見，參以己意；但精審之歷時的文藝批評家不取之。」陳說明顯出於胡氏。第 6 種比較的批評，陳鐘凡曰：「分別作者或作品屬於某種、某派，而定批評之方法者也。」胡夢華曰：「有以作者或作品屬於某派某種而定批評之方法者。」第 7 種解釋的批評，陳鐘凡謂：「以一己之意見，解釋各家作品，此類批評，無殊創作，最宜取法。」胡夢華謂：「其方法以運用己之意見以解釋作者之作品。此等解釋的文藝批評，近於創造，最可效法。」以上兩種批評方法之解說，陳

<sup>158</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7；胡愈之：〈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頁 76。

<sup>159</sup> 同上註。

說亦來自胡氏。第 8 種道德的批評，陳鐘凡說：「主張人生的藝術派者，每以道德為批評之準的。」第 9 種審美的批評，陳鐘凡云：「主張藝術的藝術派者，則以審美為批評之準的。」道德的批評胡夢華作「訓誨的批評」，並與審美的一併解釋：「訓誨式的文學批評，則以道德為批評之立腳點，安諾德主之最力。愛倫坡（Allen Poe，1809-1849）反之，主唯美主義，因之有為人生的藝術與為藝術的藝術。」陳鐘凡實將胡夢華之並說分立單說。陳著所列第 10 種為印象的批評，解釋云：「對於作品所得之印象，發為讀後感焉。」胡夢華解釋此法「為批評家一時之感觸，而又僅為個人的」，「批評者施其主觀之眼光以批評作品之優劣」。陳氏所列第 11 種為欣賞的批評：「就作品中之優點，加以欣賞而以公正之眼光批評之。」胡夢華云：「其意在褒揚作者之思想與特性，而以公正之眼光批評之」，「就作者作品內之優點加以欣賞」。陳氏所列第 12 種為科學的批評：「純采科學的方法，搜集材料，比較而評論之。」胡夢華云：「主張純粹用科學的方法，搜集材料，比較之而評判之。」<sup>160</sup>

以上對陳鐘凡文學批評知識的考古學式的考察，旨在說明陳鐘凡的現代文學批評知識，乃是來自當時的中文介紹，但其未列中文文獻，而只標英文著作。此可以見出當時學者奉西方學術為權威的心理及風氣。陳鐘凡在論述中國文學批評時往往也指出其屬於何種批評方法。如謂孔子興觀群怨「純屬道德的批評」，<sup>161</sup>〈詩大序〉「分詩為風、雅、頌三類，尤符歸納的批評之旨焉」。<sup>162</sup>

陳氏雖持文學進化觀念，著有〈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1922），先言世界文學之演進規律：「晚近言文學者莫不謂：世界文學之演進，率由謳謠進為詩歌；由詩歌而為散文。」再論證中國文學之演進：「諸夏文學，原於風謠，進為詩歌，更進而為散體。斯固世界文學演進之趨勢，無間瀛海內外，莫能外是例也。」<sup>163</sup>是證中國文學符合世界文學之普遍演進規律。但是，陳氏論述中國文學批評之歷史卻未持文學進化立場，亦未采純文學觀念，此乃其與新文學家楊鴻烈、郭紹虞等人之中國文學批評著作的重要差

<sup>160</sup> 以上所引胡夢華：〈文藝批評概論〉文字，出其論文第三部分「文藝批評之意義目的與方法」，頁 99-100；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7-8。

<sup>161</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 10。

<sup>162</sup> 同上註，頁 11。

<sup>163</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文哲學報》第 1 期（1922 年 3 月），頁 1、8-9。

異。楊、郭二氏皆將文學進化與純文學觀念結合起來，以趨向純文學觀念為進化，否則為復古。陳鐘凡則否。陳氏說：「漢魏以前，文學界域至寬，凡亦文字著於竹帛，不別駢散，有韻無韻，均得稱之為文也。」<sup>164</sup>在他看來，魏晉確認文章之獨立價值，在文學批評史地位重要。其於「魏晉文學批評」一章末云：「中國論文之有專著也，始於魏晉。時人論文，既知區分體制為比較分析的研尋；又能注重才程。蓋彼等確認文章有獨立之價值，故能盡掃陳言，獨標真諦，故謂中國文論起於建安以後可也。」<sup>165</sup>陳氏以為文學獨立成科，起於南朝宋：「魏晉文論，雖較盛前世，然斯時文學猶未嘗別自成科。自宋文帝於儒、玄、史三館外，別文學館，由是文學特立一科。」<sup>166</sup>晉宋以後有文筆之辨，「有情采聲律者為文，無情采聲律者謂之筆，故文學之界畫，自南朝而始嚴也」。<sup>167</sup>其總論南朝評文之趨勢為五點：（一）重聲律，（二）尚采藻，（三）緣情致，（四）驗材性，（五）覘風會。<sup>168</sup>文學的範圍從寬趨嚴，若按照楊鴻烈、郭紹虞所持文學進化與純文學觀念，乃是進化，但陳鐘凡無此表述。在他看來，到唐代「以筆為文，文章之界又復漫漶」。韓柳之提倡古文，「由是學者不以聲律采藻相矜尚，而以平易奇奧為古文矣」。<sup>169</sup>文學的範圍由嚴變寬，如持純文學的觀念看，此乃倒退，但陳氏未作此評判。「宋元以來，文宗散體，相沿未變」，到章學誠、阮元欲重定文界，「從南朝之舊說」，「晚近學者，或以文為偶句韻語之局稱，或以文為一切著竹帛者之達號，異議分起，訖無定論」。在陳鐘凡看來，文學觀念的變化未能合乎進化規律非獨中國為然，「進觀遠西學者之持說，亦未嘗不如是也」。<sup>170</sup>

不同於楊鴻烈始終以西方文學觀念衡量組織中國材料，整個架構是西方式的，陳鐘凡一旦進入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敘述，西方文學的觀念往往被擱置，轉而按照傳統的脈絡敘述。其書分周秦、兩漢、魏晉、宋齊梁陳、北朝、隋唐、兩宋、元明、清代諸階段敘述批評史，建立了批評史的歷史

<sup>164</sup> 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3。

<sup>165</sup> 同上註，頁31。

<sup>166</sup> 同上註，頁31-32。

<sup>167</sup> 同上註，頁3。

<sup>168</sup> 同上註，頁62-64。

<sup>169</sup> 同上註，頁4。

<sup>170</sup> 同上註，頁4-5。

階段的架構，其分文評、詩評、詞曲評等體裁敘述，在歷史架構中確立了分體的批評史敘述方式。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與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皆為以西方文學批評觀念整理中國傳統詩文評的最早著作，前者代表建立理論體系的努力，後者代表建立歷史架構的嘗試。陳氏未有將西洋文學批評觀念貫徹到批評史的具體論述中，未如楊鴻烈、傅庚生一樣賦予傳統詩文評現代的理論系統，事實上後來的郭紹虞、羅根澤等也都是如此。但在今天看來，楊、傅二氏的系統建構並不成功，陳、郭、羅諸人無論是主觀上無意還是客觀上未能建構一個西方式的架構，反而未失傳統的脈絡與特色。這些早期的探索無論成敗得失都給後來者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值得深入總結與思考。

【責任編校：黃璿璋、廖方瑜】

## 徵引文獻

### 專著

朱光潛 Zhu Guanqian：《朱光潛全集》*Zhu Guanqian quanji* 第3、8卷，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1996年。

余英時 Yu Yingshi：《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Zhongguo sixiang chuantong de xiandai quansh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anjing chuban gongsi，1987年。

周全平 Zhou Quanping：《文藝批評淺說》*Wenyi piping qianshu*，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7年。

周作人 Zhou Zuoren：《藝術與生活》*Yishu yu shenghuo*，北京 Beijing：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Beijing shiyue wenyi chubanshe，2011年

《東方雜誌》社 *Dongfang zazhi she* 編：《文學批評與批評家》*Wenxue piping yu pipingjia*，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4年。

胡適 Hu Shi：《胡適全集》*Hu Shi quanji* 第1-3卷，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7年。

茅盾 Mao Dun：《茅盾文藝雜論集》*Mao Dun wenyi zalun ji* 上集，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1981年。

- 梁實秋 Liang Shiqiu：《梁實秋文集》*Liang Shiqiu wenji* 第1、7卷，廈門 Xiamen：鷺江出版社 Lujiang chubanshe，2002年。
- 章太炎 Zhang Taiyan 撰，龐俊 Pang Jun、郭誠永 Guo Chengyong 疏證：《國故論衡疏證》*Guogu lunheng shu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年。
- 陳平原 Chen Pingyuan：《做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Zuowei yizhong sixiang caolian de wus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8年。
- 陳鐘凡 Chen Zhongfan：《中國文學批評史》*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28年。
- 寒光 Han Guang：《林琴南》*Lin Qinnan*，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35年。
- 楊鴻烈 Yang Honglie：《中國詩學大綱》*Zhongguo shixue dagang*，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8年。
- ：《中國文學雜論》*Zhongguo wenxue zalun*，臺北 Taipei：中新書局 Zhongxin shuju，1977年。
- 鄭振鐸 Zheng Zhenduo、傅東華 Fu Donghua：《文學百題》*Wenxue baiti*，上海 Shanghai：生活書店 Shenghuo shudian，1935年。
- 鄭振鐸 Zheng Zhenduo：《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Zhongguo xin wenxue daxi, wenxue lunzhe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1981年。
- ：《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Zheng Zhenduo gudian wenxue lunwe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4年。
- ：《鄭振鐸文集》*Zheng Zhenduo wenji* 第7卷，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88年。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七綴集》*Qizhui ji*，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00年。
- 〔日〕本田成之 Honda Shigeyuki：《支那經學史論》*Shina keigaku shiron*，京都 Kyoto：弘文堂書房 Kobundo shobo，1927年。
- 〔日〕本田成之 Honda Shigeyuki 著，孫俚工 Sun Lianggong 譯：《中國經學史》*Zhongguo jingxueshi*，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35年。

- 〔日〕本間久雄 Honma Hisao：《新文學概論》*Shi bungaku gairon*，東京 Tokyo：新潮社 Shinchōsha，1917 年。
- 〔日〕本間久雄 Honma Hisao 著，章錫琛 Zhang Xichen 譯：《新文學概論》*Xin wenxue gailun*，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5 年；1926 年。
- 〔日〕兒島獻吉郎 Kojima Kenkichiro：《支那文學考》*Shina bungaku ko* 第 1 編，東京 Tokyo：目黑書店 Meguro shoten，1920 年。
- ：《支那文學雜考》*Shina bungaku zakko*，東京 Tokyo：關書院 Seki shoin，1933 年。
- 〔日〕兒島獻吉郎 Kojima Kenkichiro 著，孫俚工 Sun Lianggong 譯：《中國文學通論》*Zhongguo wenxue tonglun* 上卷，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5 年。
- 〔日〕鈴木虎雄 Suzuki Torao 著，孫俚工 Sun Lianggong 譯：《中國古代文藝論史》*Zhongguo gudai wenyi lunshi*，上海 Shanghai：北新書局 Beixin shuju，1928；1929 年。
- 〔日〕鹽谷溫 Shionoya On：《支那文學概論講話》*Shina bungaku gairon kowa*，東京 Tokyo：大日本雄辯會 Danihon yubenkai，1919 年。
- 〔日〕鹽谷溫 Shionoya On 著，陳彬龢 Chen Binhe 譯：《中國文學概論》*Zhongguo wenxue gailun*，北京 Beijing：樸社 Pushe，1926 年。
- 〔日〕鹽谷溫 Shionoya On 著，孫俚工 Sun Lianggong 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Zhongguo wenxue gailun jianghua*，上海 Shanghai：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1929 年。
- 〔美〕溫徹斯特 Caleb Thomas Winchester 著，景昌極 Jing Changji、錢堃新 Qian Kunxin 譯：《文學評論之原理》*Wenxue pinglun zhi yuanl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4 年。
- 〔英〕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 著，林紓 Lin Shu、魏易 Wei Yi 譯：《孝女耐兒傳》*Xiaonü naier zhuan* 上卷，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15 年。
- ：《塊肉餘生述》*Kuairou yusheng shu*，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0 年。
- 〔英〕赫胥黎 T. H. Huxley 著，嚴復 Yan Fu 譯：《天演論》*Tianyan lun*，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47 年。

Caleb Thomas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9.

Charles Mills Gayley and Fred Newton Sco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Bases in Aesthetics and Poetic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899.

Gayley and Benjamin Putnam Kurt, *Lyric, epic and allied forms of poetry*,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20.

Richard B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Theodore Whitefield Hunt,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William Henry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mpany, 1913.

####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向遠 Wang Xiangyuan :〈中國現代文藝理論和日本文藝理論〉“Zhongguo xiangdai wenyi lilun he riben wenyi lilun”·《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998年第4期。

王伯祥 Wang Boxiang :〈歷史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Lishi de ‘zhongguo wenxue piping lunzhu’”·《文學週報》*Wenxue zhoubao* 第224期, 1926年5月。

朱光潛 Zhu Guanqian :〈中國文學之未開闢的領土〉“Zhongguo wenxue zhi wei kaipi de lingtu”·《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第23卷第11號, 1926年6月。

朱自清 Zhu Ziqing :〈關於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Guanyu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de liangge yijian”·《國文月刊》*Guowen yuekan* 第63期, 1948年1月。

佚名 Yi Ming :〈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Jieshao *Wenxue pinglun zhi yuanli*”·《學衡》*Xueheng* 第28期, 1924年4月。

周作人 Zhou Zuoren :〈林琴南與羅振玉〉“Ling Qinnan yu Luo Zhenyu”·《語絲》*Yusi* 第3期, 1924年12月。

- 《東方雜誌》社 *Dongfang zazhi she* 編：《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第 26 卷第 1 號，1929 年 1 月。
- 林語堂 Lin Yutang：〈機器與精神〉“Jiqi yu jingshen”，《中學生》*Zhongxuesheng* 第 2 號，1930 年 2 月。
- 眉睫 Mei Jie：〈《文學概論講義》整理附記〉“*Wenxue gailun jiangyi zhengli fuji*”，《現代中文學刊》*Xiandai zhongwen xuekan* 2010 年第 4 期。
- 秋原 Qiu Yuan：〈文藝起源論〉“*Wenyi qiyuan lun*”，《北新》*Beixin* 第 2 卷第 22 期，1928 年 10 月。
- 胡先驕 Hu Xiansu：〈說今日教育之危機〉“*Shuo jinri jiaoyu zhi weiji*”，《學衡》*Xueheng* 第 4 期，1922 年 4 月。
- 胡愈之 Hu Yuzhi：〈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Wenxue piping: qi yiyi jifangfa*”，《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第 18 卷第 1 號，1921 年 1 月。
- 胡夢華 Hu Menghua：〈文藝批評概論〉“*Wenyi piping gailun*”，《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第 21 卷第 4 號，1924 年 2 月。
- 浩徐 Hao xu：〈主客答問〉“*Zhuke dawen*”，《現代評論》*Xiandai pinglun* 第 5 卷第 106 期，1926 年 12 月。
- 馬睿 Ma Rui：〈作為文學選擇與立場表達的西學中譯——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中譯本解析〉“*Zuwei wenxue xuanze yu lichang biaoda de xixue zhongyi: Winchester Wenxue pinglun zhi yuanli zhongyiben jixi*”，《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013 年第 1 期。
- 《國粹學報》館 *Guocui xuebao guan* 編：《國粹學報》*Guocui xuebao* 第 1 期，1905 年 1 月。
- 張健 Zhang Jian：〈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朱自清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Jiejing xifang yu benlai mianmu: Zhu Ziqing de zhongguo wenxue piping yanjiu*”，《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11 年第 1 期。
- ：〈純文學、雜文學觀念與中國文學批評史〉“*Chun wenxue, za wenxue guannian yu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Fud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018 年第 2 期。

梁實秋 Liang Shiqiu:〈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Jinnian lai zhongguo zhi wenyi piping”，《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第 24 卷第 23 號，1927 年 12 月。

——：〈〈英文文藝批評書目舉要〉之商榷〉“‘Yingwen wenyi piping shumu juyao’ zhi shangque”，《益世報·文學週刊》*Yishibao, wenxue zhoukan* 第 29 期，1933 年 6 月。

梅光迪 Mei Guangdi:〈評提倡新文化者〉“Ping tichang xin wenhua zhe”，《學衡》*Xueheng* 第 1 期，1922 年 1 月。

梅光迪 Mei Guangdi 講，何惟科 He Weike 記：〈中國文學在現在西洋之情形〉“Zhongguo wenxue zai xianzai xiyang zhi qingxing”，《文哲學報》*Wenzhe xuebao* 第 2 期，1922 年 7 月。

陳俊啟 Chen Junqi:〈由《文學概論講義》探尋梅光迪 1920 年代的文學思想〉“You *Wenxue gailun jiangyi* tanxun Mei Guangdi 1920 niandai de wenxue sixiang”，《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56 期，2017 年 3 月。

陳國球 Chen Guoqiu:〈文學批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兼談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Wenxue piping zuowei zhongguo wenxue yanjiu de fangfa: jiantan Zhu Ziqing de wenxue piping yanjiu”，《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20 期，2013 年 12 月。

陳鐘凡 Chen Zhongfan:〈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Ershi nian lai woguo zhi guogu zhengli”，《學藝》*Xueyi* 第 16 卷第 1 號，1937 年 1 月。

——：〈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Zhongguo wenxue yanjin zhi qushi”，《文哲學報》*Wenzhe xuebao* 第 1 期，1922 年 3 月。

——：〈哭先師石遺老人〉“Ku xianshi Shiyi laoren”，《書林》*Shulin* 第 2 卷第 4 期，1937 年 8 月。

傅東華 Fu Donghua:〈《文學之近代研究》譯序〉“*Wenxue zhi jindai yanjiu yixu*”，《文學週報》*Wenxue zhoubao* 第 210 期，1926 年 1 月。

傅瑩 Fu Ying:〈外來文論的譯介及其對中國文論的影響——從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譯本談起〉“Wailai wenlun de yijie jiqi dui zhongguo wenlun de yingxiang: cong Honma Hisao de *Xin wenxue gailun yi ben tanqi*”，《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inan xuebao (zhecue shehui kexue ban)* 2001 年第 6 期。

- 賀昌群 He Changqun：〈哭梅迪生先生〉“Ku Mei Disheng xiansheng”，《思想與時代月刊》*Sixiang yu shidai yuekan* 第 46 期，1947 年 6 月。
- 賀麟 He Lin：〈文學批評〉“Wenxue piping”，《石室學報》*Shishi xuebao* 第 3 期，1923 年 12 月。
- 聞一多 Wen Yiduo：〈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Tiaozheng daxue wenxueyuan zhongguo wenxue waiguoyuwenxue erxi jigou chuyi”，《國文月刊》*Guowen yuekan* 第 63 期，1948 年 1 月。
- 劉文翹 Liu Wenhe：〈介紹《文學評論之原理》〉“Jieshao Wenxue pinglun zhi yuanli”，《文哲學報》*Wenzhe xuebao* 第 3 期，1923 年 3 月。
- 蔣寅 Jiang Yin：〈鈴木虎雄《中國詩論史》與中國文學批評史敘述框架的形成——尤以明清三大詩說為中心〉“Suzuki Torao *Zhongguo shilun shi yu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xushu kuangjia de xingcheng: you yi mingqing sandashishuo wei zhongxin*”，《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Anhui daxue xuebao (zhecue shehui kexue ban)* 2013 年第 2 期。
- 鄭振鐸 Zheng Zhenduo：〈文學的統一觀〉“Wenxue de tongyiguan”，《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3 卷第 8 號，1922 年 8 月。
- ：〈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Zhengli zhongguo wenxue de tiyi”，《文學旬刊》*Wenxue xunkan* 第 51 期，1922 年 10 月。
- ：〈林琴南先生〉“Lin Qinnan xiansheng”，《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5 卷第 11 號，1924 年 11 月。
-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Yanjiu zhongguo wenxue de xin tujing”，《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Xiaoshuo yuebao: zhongguo wenxue yanjiu* 第 17 卷號外上冊，1927 年 6 月。
- 〔日〕鈴木虎雄 Suzuki Torao：〈格調・神韻・性靈の三詩說を論ず〉“Kakuchou, shinin, shoryo no sanshisetsu wo ronzu”，《藝文》*Geibun* 第 2 卷第 7、8、9、10 號，1911 年 7、8、9、10 月；第 3 卷第 2 號，1912 年 2 月。
- ：〈周漢諸家の詩に對する思想〉“Shukan shoka no shini taisuru shiso”，《藝文》*Geibun* 第 10 卷第 1、2 號，1919 年 1、2 月。
- ：〈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文學論〉“Nanbokucho no jidai bungaku ron”，《藝文》*Geibun* 第 10 卷第 10、11、12 號，1919 年 10、11、12 月；第 11 卷第 2、3 號，1920 年 2、3 月。

〔美〕莫爾頓 (Richard Breen Moulton) 著，傅東華 Fu Donghua 譯：〈文學之近代研究〉“wensexue zhi jindai yanjiu”，《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7 卷第 1 號，1926 年 1 月。

〔美〕蒲克 Gertrude Buck 著，傅東華 Fu Donghua 譯：〈社會的文學批評〉“Shehui de wensexue piping”，《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第 16 卷第 6 號，1925 年 6 月。

#### 報紙文章

王統照 Wang Tongzhao：〈文學批評的我見〉“Wensexue piping de wojian”，《晨報副刊·文學旬刊》*Chenbao fukan, wensexue xunkan* 第 1 版第 2 號，1923 年 6 月 11 日。

和 He：〈文學批評與編輯中國文學史〉“Wensexue piping yu bianji zhongguo wensexushi”，《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 第 1 版，1924 年 10 月 15 日。

楊鴻烈 Yang Honglie：〈中國文學觀念的進化〉“Zhongguo wensexue guannian de jinhua”，《京報副刊》*Jingbao fukan* 第 3 版第 1 號，1924 年 12 月 5 日。

——：〈中國詩學大綱〉“Zhongguo shixue dagang”，《晨報副刊·文學旬刊》*Chenbao fukan, wensexue xunkan* 第 1 版第 49 號，1924 年 10 月 5 日。

#### 網站資料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Nanjing daxue lishi xueyuan：〈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歷屆畢業生名錄〉“Nanjing gaodeng shifan xuexiao wenshidibu lijie biyesheng minglu”參見：<https://history.nju.edu.cn/02/83/c28628a459395/page.htm>，瀏覽日期：2021 年 4 月 20 日